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
局面的形成

(1938 年 10 月 ~ 1943 年 12 月)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h.com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第一节 中日双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一、武汉失守后中国战场上的战略态势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为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日军挟其战争利器,赢得了每一次中日军队会战的成功,占领了它企图占领的城市,但令日军大本营惶恐的是,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但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由于兵力不足,即使在占领区也只不过控制点线而已,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沦陷区,使之不得不在正面战线上停止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战争已不可避免地趋于持久化,这一直是中国所期待出现的局面。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已预见到武汉失守将迎来漫长的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确认,中国的守势时期已告结束,已进入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

日军无法速战速决,这意味着军事委员会的持久消耗战略取得了相当成功,但是,中国方面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截至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沿江、沿海各工商业中心城市尽被日军占领。至1939年初,沦陷区的面积占全国领土的23%,而且这些地区均属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地区。国民政府已退至离海岸线遥远的西南、西北的内地省份。陕西、甘肃、宁夏、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新疆等边陲和内地省份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这些省份虽然疆土辽阔,但除四川盆地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外,其余省区都是中国经济最落后的贫困地区。中国还丧失了91%的关税、97%的机器制造业、75%的面粉工业、75%的纺织工业。国民政府丧失了大量土地、人口,财政收入锐减,而且中国沿海沿江地区的现代工业也被日军摧毁殆尽,抗战着的中国几乎完全倒退到农业时代去,这对持久抗战并无致命妨碍,但要积蓄能够用于反攻的力量便极为困难了。就交通而言,日军控制着津浦、正太、同蒲、京沪、沪杭、江南(南京至芜湖)各铁路干线及平汉路北段(新乡以北),约占中国铁道长度的84%。由于交通命脉被日军掌握,沦陷区被分割成条条块块。日军兵力不足,但这一缺陷由于其转运兵力方便快捷而得到某种弥补,而中国大后方的内部交通甚为不利,崇山峻岭虽构成大后方的天然屏障,但也使各战区间转运兵力、协同作战颇为困难,后勤补给极为不易,几乎处于各自为战的状况。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守尚有余勇,战略

反攻则力不从心的状态,从而形成了在华北以包头、大同、运城、博爱、开封、淮阳、亳县之线为作战线,在华中及华东以合肥、黄梅、信阳、岳阳、宁武、芜湖、杭州之线为作战线的敌我战略相持态势。1938年底形成的这一对峙格局维持了很长时间,其后虽不断有局部性的变化,但到1944年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时才发生重大改变。

二、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与中方战略指导的变化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因应新的战争形势,在南岳、西安、武功等地召开军事会议,目的在于总结从抗战全面爆发至武汉、岳阳失守时期的得失教训,确定以后的战略方针与军事部署,其中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最为重要。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军事委员会在湖南的南岳衡山举行军事会议,蒋介石及第3、第9战区将领200多人参加了会议。

蒋介石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对抗战时期的划分作了说明。在此之前,根据国民政府的官方说法,将“开战到南京失陷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期”,^①蒋介石认为这种划分已不恰当,指出应以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岳阳失守为抗战的第一时期,其后则为抗战的第二时期。在第一时期中,中国处于守势防御;进入第二时期后,日军力量已涉极限,因而中国开始步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阶段。

对于中日军队在战争中的优劣之处,蒋介石作了评判。他认为日军具有如下特点,即勇人直前,誓死达成任务;忍苦耐劳与中国军队相似;贯彻命令的精神与习惯;忠群爱国形成的认同感;擅

^① 《作战经过(二)》,第127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长搜索情报;战斗纪律极严等。并指出国民党军队有 12 大耻辱,主要是阵亡官兵暴尸战场;伤病员无处收容;不能防止士兵逃亡;军行所至民众逃避;谎报军情;逃避责任;不能贯彻命令等等。

蒋介石还对武汉失守前最高统帅部战略指导的正确性进行了辩护,表示统帅部的战略是避免在华北与日军决战,而要将日军引诱到长江流域来,从而以空间换取时间,完成了持久作战的各项准备。不过,对于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困守南京的失败、马当要塞的失守与日军从大鹏湾登陆等挫折,蒋介石自称为“统帅职责所在,实在不能辞其责”。^①

南岳军事会议最大目的是整理军队,建立军队,在军事方面改革甚多,对武汉失守后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指导也有重大影响,主要内容有下列诸方面。

1. 重划战区。南岳会议后,军事委员会调整了战线,划分了 10 个战区,计有第 1、第 2、第 3、第 4、第 5、第 8、第 9、第 10 及鲁苏、冀察战区。第 1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有河南及安徽一部,共有 12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1 个骑兵师,1 个骑兵旅。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辖有山西及陕西一部,共有 32 个步兵师,14 个步兵旅、5 个骑兵师和 3 个骑兵旅。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辖有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计有 22 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第 4 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有广东、广西,计有 18 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第 5 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辖有皖西、鄂北、豫南,计有 26 个步兵师,1 个骑兵队及 1 个骑兵旅。第 8 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辖有甘、宁、青及绥远等地,计有 6 个步兵师,9 个步兵旅,4 个骑兵师及 4 个骑兵旅。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有鄂南及湖南全省,计有 52 个步兵师。第 10 战区:司令长官蒋鼎

^① 《作战经过(二)》,第 177 页。

文,辖区为陕西方面,计有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与1个骑兵旅。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辖区为苏北及山东方面,计有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辖有冀察方面,共有5个师与1个骑兵师。

2. 减少指挥层级。军事委员会自抗战开始以后,“深感我军指挥阶层太多,自最高统帅部之军委会起,中间经过战区、兵团、集团、军,始能达到战略单位之师,共有七级”。^① 由于中国地区辽阔,交通及通讯落后,指挥层级过多,导致命令下达容易迟误,影响指挥及兵力运用,因而决定废除兵团、军团两级,改以军为战略单位,并将师以下的旅也一并撤销,这样在战略单位军以上的指挥机构只有军事委员会、战区、集团军3级,有利于战略与战术指挥。

3. 设立桂林、天水行营。军事委员会为有效统一指挥南北各战区作战,增设桂林、天水行营,以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南战场各战区作战,以程潜为天水行营主任,负责协调和指挥北战场的各战区;同时撤消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

4. 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为沦陷区专管机关,任务是发动沦陷区民众对敌抗战,消灭伪组织,最低限度是使沦陷区人民不与敌伪合作,从而使日军号令不出城门,势力及于城市和交通线,而不能遍及广大农村。战地党政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李济深任副主任,并在各沦陷区设立分会。

5. 整训军队。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中即宣布:“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② 整训的含义就是改良编制、充实装备、统一人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以

① 《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第208页。

② 《作战经过(二)》,第176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从1938年底至1939年4月,整训部队为26个军和27个师,迟至7月底始完成。第二期部队整训从1939年8月1日起至11月底止,参加整训的部队为40个军。这一整训措施对中国军队战斗力的恢复和加强有一定作用。

战略战术指导上的重大变更。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的精神,1939年1月7日,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主要内容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开展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①军事委员会还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运动战重于阵地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一系列主张。总的来说,军事委员会的战略比起武汉失守前有相当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视沦陷区,力求加强对日军后方的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将日军局促于点线,防止日军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为此,军事委员会设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并日益重视敌后游击战,从而在敌后设立了冀察、苏鲁战区,将一部分正规军输送至敌后从事游击战。二是准备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击,以策应敌后游击战,转变不利态势,因而在1939年正面战场有过两次规模较大的反攻,即春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三、日军被迫转入持久态势

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日军大本营将国民政府视为一个地方

^① 《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1939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政权,1938年11月作了如下形势判断,即国民政府“既已丧失中原,逃窜内地,失去主要水陆交通线及丰富资源和居民之大半,则我方若适时采取措施,加速其内部崩溃过程,至少使之成为一个地方政权当非难事。故从战略上看,可以这样说:帝国已经摧垮了抗日的中国政权。下一阶段为实行政略进攻,以抵于成”。^①所谓政略进攻就是施展谋略手腕从内部瓦解中国抗日阵营,扶植日军羽翼下的傀儡政权。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声明中提出:“如果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②这种说法改变了同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傲慢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政策,公开诱惑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与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动摇分子。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系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③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举动,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中国特定地区驻兵,在华北和内蒙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向日本提供方便。日本政府在声明中还伪善地宣称,如果中国政府答应日本所提条件,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愿意考虑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不过,日本的政治谋略和诱降政策并未动摇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只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甘作汉奸,脱离了抗战阵营。

在军事上,日军开始不得不转入战略持久态势,以适应长期战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56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77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8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争的状态。1938年11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确定作战的基本方针为“确保占领地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①具体指导如下:

(1)华北方面,要专心确保占据地区并使之安定,特别要首先恢复河北省北部、山东省、山西省北部及蒙疆等重要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按需要可在占据地区内,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战。

(2)华中方面,一方面要确保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占据地区的安定,特别要首先迅速恢复上海、南京、杭州间地区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另一方面,配置在武汉地区的作战军,要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协同海军确保从岳州下游扬子江的交通。大概以安庆、信阳、岳州、南昌间地区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企图。

(3)华南方面,以切断中国的补给为目的,配置最低限度的兵力,以广州、虎门为根据地。大概以惠州、从化、清远、北江、西江间为作战地区,粉碎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图。1938年12月6日,日军大本营又在《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详细规定:

(1)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

(2)治安地区大体包括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新黄河、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区,特别是太原平原、山东胶济沿线地区、京沪杭三角地带。

(3)上述以外的占领区则为作战地区,在武汉及广州各配置一支新部队,从而成为在政治和战略上压制抗日势力的根据地,中国军队集中兵力来攻击则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力戒扩大缺乏准备的战线,进行小接触。为此,根据敌我形势而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68页。

配备的兵力,要控制在最小限度内。^①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上述战略指导可以发现,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因战线拉得过长,导致机动兵力匮乏,已自动停止进一步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而使用主要力量扫荡沦陷区内的游击队,巩固占领区域,尤其是华北地区吸引了将近侵华日军总数一半的力量,以对付八路军及其它敌后游击队。在武汉地区只留下第 1 军,作为惟一的野战机动兵团,对付中国的第 5、第 9 战区部队,以局部的战术攻势,达成战略守势上的有利地位,对中国野战军主力实行反消耗战。为了尽早使中国屈服,日本开始采用各种间接手段瓦解中国政府抗战的信心和力量,在政治上扶植傀儡政府,不断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在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在外交上,则对英法等国施加压力,阻止它们在物质上支持中国,同时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以求窒息中国,在持久战中拖垮中国。

第二节 南昌、随枣会战

一、南昌失守

武汉会战后,正面战场上的战事一时陷于沉寂,战争双方各自忙于整理补充及全面性的战略调整。从 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2 月,正面战场上未发生大规模的会战。不过,中日方面都明白,战事的沉寂是暂时的,对南昌或长沙的攻防将是下一次会战的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 2 卷,第 2 分册,第 71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焦点。

南昌为江西省会,东依鄱阳湖,西傍赣江,它既掩护着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从而对长江呈一线型展开的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城郊还建有飞机场,中国飞行员经常驾机前往轰炸在长江中航行的日本军舰,使日海军大为苦恼。南昌成为日军所必攻,中方所必守的军事重镇。

早在武汉会战时,日方就决定攻占南昌,但担负此项任务的第101、第106师团在南浔线上一再受挫,勉强占领德安后,已成强弩之末,与中国军队隔修水河对峙长达半年之久。武汉会战结束后,南昌战略位置更显突出,因而日本华中派遣军选择南昌为第一个进攻目标。根据1939年2月6日华中派遣军颁发的《对南昌作战要领》,日军的作战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皖南及浙江方面中国军队的主要联络线。^①

第11军奉华中派遣军之命负责攻掠南昌,其司令官为冈村宁次中将,下辖7个师团和1个混成旅团,计20余万人。该军以武汉三镇为主要基地,以中国的第5、第9战区为主要对手。冈村宁次以第3、第13、第16等3个师团对付第5战区,以第6、第9、第101、第106等4个师团对付第9战区。1939年1月31日,冈村宁次已制订了攻占南昌的具体作战计划,决定以主力直接突破修水正面阵地,然后经安义、奉新,渡过赣江直取南昌,以避免在南浔线上强攻。他决定以第101、第106师团任主攻,为这两个素质较差的师团配备了第11军所拥有的大部分坦克和大炮,计有1个坦克联队、2个独立山炮联队,3个15厘米榴弹炮联队,2个10厘米加农炮大队,使这两个师团具有了强大突击力。他计划以第6师团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14页。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在箬溪、武宁一带助攻,这样,参与南昌作战的日军约 3 个师团。日军并筹划在鄂西和浙江采取有限军事行动分散中方注意力。不过,由于阴雨经旬不绝,道路泥泞,特别是炮兵群集中缓慢,拖到 3 月中旬才准备完毕。

1939 年 2 月以后,日军进攻南昌的迹象已日渐明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南昌,试图以强有力的野战兵团从西南向南浔线之敌主动发起攻势,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从 3 月 26 日至 3 月初,重庆方面曾三次指令第 9 战区“自主的转移攻势”。^① 但该战区一直表示准备不周,并无动作。

第 9 战区拥有 51 个半师,40 余万人,野战重炮合计 139 门。战区辖地为鄂南、赣北及湖南全境,其第一线防御阵地夹在中国两个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战线绵亘 400 余公里,沿线配置有 25 个半师,其中以湖南的汨罗江地区与南昌以北的修水南岸阵地兵力配备密度最大。每 15 公里配备有 1 个师。这一带湖泊众多,本来是利于防御者的,但兵器的变化已扭转了原先的格局,拥有大量汽艇和浅水军舰的日军控制了湖面,反使这些湖泊成为迂回中国军队的绝好通道,令守军在湖防上耗费了大量精力。不过这些地区除两大湖泊多洼地外,其它地方山地起伏,防守较易,面不利于敌方炮骑兵和机械化部队运动。

南昌方面及南昌以北地区的防御由罗卓英部第 19 集团军担任。该集团军拥有 12 个师,主力布防在修水南岸,西自箬溪,东达修水南岸鄱阳湖西岸,呈一线型展开,从西而东依次是第 70 军李觉部(辖第 19、第 107 师)、第 49 军刘多荃部(辖 10、第 329 师)、第 79 军夏楚中部(辖第 82 师、第 98 师、第 104 师)、第 32 军宋肯堂

^① 《军令部关于第 9 战区屡次变更进攻南昌时间的说明及其意见》(1939 年 4 月 24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部(139师、第141师),另有直辖的预5师等。后方则控制有3个师的预备队,第98师驻滩溪,第193师驻乐化,第118师驻万家埠。

3月8日,蒋介石电令第9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日期为3月15日”。^① 时任第9战区代司令官的薛岳对蒋的电令态度消极,以为敌人善于固守,己方则短于攻坚,因而对使用大兵团强攻德安、瑞昌间日军阵地的战略抱有疑虑。由于情报不确,薛岳误认为日军有7个师团在第9战区内,并错误地判断“本战区当面之敌调动频繁,除仍积极加强工事一面整顿外,目下似无若何企图”。^② 3月17日,日军已部署妥当开始攻击,反攻之议便自然流产了。

赣北春季多雨,3月3日起连日降雨,修水河水暴涨了3米,第19集团军各部在修水南岸构筑的工事阵地大部被水浸没,破坏很重,日军抓住时机发动攻势。

3月17日,驻防湖口一带的第116师团1个旅团从湖口乘船横渡鄱阳湖,攻打修水南岸阵地东端的吴城镇,它正位于修水河流入鄱阳湖的入口处。第32军和预5师等屡挫敌锋,第721团坚守至23日,经巷战肉搏后才于夜间放弃吴城镇,退守二线阵地,使日军无法深入。

日军在吴城镇一带的攻击只是牵制性的佯攻,其主攻方面选择在修水南岸的中间阵地。3月20日下午,日军集中200余门大

①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9年3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薛岳致蒋介石电》(1939年3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炮的强大火力将南岸尚在修复中的中国守军阵地基本摧毁,守军牺牲惨重。同时,日军还“混用毒弹”,“76 师师长王凌云、旅长龚清文、团长唐际遇 105 师团长于汝源相继中毒”。^①傍晚,第 101 师团、第 106 师团借烟幕掩护从永修、虬津、白槎间强渡修水,一举突破由第 79、49 军防守的纵深约两公里的 3 道阵地。守军在强大炮火的猝然打击下陷于混乱之中,尤其是日军施放毒气,引起军心恐惧,部队联系失灵,各自向后溃退。

21 日,罗卓英急令预 9 师、第 118 师向前方增援,以图堵住缺口,可两部在大雨滂沱的情形下行军缓慢,未能稳住战局,且在慌乱中未能彻底破坏通往南昌的公路。第 106 师团指向安义,第 101 师团指向奉新,22 日突破正面阵地的日军沿公路大道疾驰南下,南昌方面仅有第 139 师在南昌正北的乐化布防,城内只有非正规的保安队,犹如一座空城。

第 9 战区长官部见南昌方面已危如累卵,令高荫槐第 1 集团军(辖第 58、第 60 军)及俞济时第 74 军火速增援南昌方面,以求挽回局势。22 日并令前线各部队“坚守滩溪市东西地区,最低支持 7 日,候 102 师、139 师、第 1 集团军三四个师即可到达乐化、安义之线,然后出击,定可获胜”。可事实是滩溪于 21 日就已弃守,刘多荃第 49 军、夏楚中第 79 军已不能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刘军节节向安义以西撤退,夏军则向源河东岸退去。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下令,将第 3 战区鄱阳湖东岸的守备部队以及驻防东乡、进贤地区的第 102 师拨归罗卓英指挥。令第 1 集团军第 70、第 74 军迅速展开于南昌西北的高安、奉新、靖安之线,增援的主力尚在行军途中,日军机械化部队就一鼓作气地冲跨

^① 《罗卓英致蒋介石电》(1939 年 4 月 2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了守军在靖安万家埠、安义尚未建成的防线。23日占领安义,次日攻占了万家埠和奉新。到23日夜间,凶猛的日军前锋——石井坦克联队已向南深入120公里。占领奉新后,日军以一联队兵力向高安方向进军,阻击第1集团军等增援部队。而第101、106师团主力由安义左旋向南昌突进,绕过守军在乐化等构筑好的坚固防御阵地,指向南昌背腹部,而对尚未从混乱中过来,并已被日军抛在后面的中国军队,仅留一部分阻击、牵制。本来易守难攻的南昌城,一下子裸露在日军刀锋之下。

南昌城防空虚,而第32军及预5师与日军相持于万家埠至吴城镇一线,已成孤立之势。24日,罗卓英令第32军等回调南昌。第32军军部奉命星夜迁至南昌坐镇。因军主力尚未到,遂紧急动员南昌的保安队、宪兵和警察布防。

26日清晨,日军由奉新进抵大城,与刚抵达的第32军一部遭遇,展开激战。日军骑兵百余、战车4辆突入,抵达赣江,欲渡过中正桥冲向南昌城。当此危急之际,第32军所部不顾一切将中正桥炸毁,阻止了日军渡江。不过第32军也仅有两营士兵渡过赣江,其余均被隔在两岸与日军背水苦战。

当此之际,由第3战区来援的第16、第79师尚停留在东乡、进贤一线,离南昌尚有数日路程。而第一集团军与第74军强行东进,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3月26日傍晚,日军主力陆续乘坐民船,由生米街等处渡过宽达1000米的赣江口。次日晨,日军从北、西、南三面会攻南昌城,守城部队约两团在狭窄的街道上与日军逐屋巷战,直到深夜始放弃南昌。南昌城的重要建筑及民房大部被炮火夷为废墟。同日,日军一部南下切断了浙赣铁路。

南昌攻防战激烈进行之时,在南昌西北、修水上游地武宁也发生剧烈战事。此处依傍九宫山,山地崎岖,易守难攻。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3月20日,日军第6师团为配合南昌方面进攻,由箬溪渡过修河进犯武宁。武宁一带的守军为彭位仁第73军、李玉堂第8军和第30集团军(辖第78、第72军),由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统一指挥。

20日拂晓,日军攻击第73、第8军的上滩头、麦加王等阵地(均在修水北岸)。21日更以一部渡过修水攻打第78军阵地。王陵基于23日督师反攻,正逢日军也在进攻,一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中国军队稳住了阵脚,第15、第3师还击退了当面之敌,克复了棺材山、望人脑等地。

次日,日军全力反扑,第73军伤亡过重,奉命调到后方整补,由第72军接替73军及第8军的防御阵地。交防中,第73军、第8军撤离过早,阵地出现缺口,日军乘第72军接防立足未稳,挥兵猛进,同时拼命打击第78军的侧翼阵地,迫使这两个军从修水北岸的望人脑、棺材山及南岸的洞口、罗坪等阵地后撤。日军连日苦战后,于29日拂晓占领武宁。第30集团军等部退至武宁以西的烟港街南北之线与日军对峙。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它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第9战区防守的地区是正面战场上最为适合双方展开战略行动的地区,军事委员会调集精锐主力军守卫,但从3月17日至3月27日,日军仅用了10天时间便占领了南昌,切断了浙赣铁路,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难,军事补给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日方成功地达成了进攻意图,这得力于其炮兵集中使用,火力强大;机械化部队突击力强;善于把握战机,战术部署得当。中方的一系列失误也促使日军顺利进展。战前,第9战区未能正确判断敌情,不能知己知彼,先发制人。战开始后罗卓英等指挥无方是轻失南昌的直接原因,如修水南岸至南昌间缺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纵深阵地,主力在第一线呈一字形展开,预备队也使用过早等。而第3战区未能有效配合南昌方面第19集团军作战,而且没有奉命早日在东乡、进贤一带集结3个师,以致南昌空虚时,未能迅速派兵前往填防,这也是致命的过失。

南昌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丢失了大量武器装备,且人员伤亡十分严重,战死14354名,受伤17033名,失踪10565名。^①日方宣布日军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显然,日方数字有缩小之嫌。^②

二、中方反攻南昌受挫

日军攻陷南昌后,第101师团留守南昌及近郊,第106师团则控制于南昌以西,并以主力向西追击,一部沿湘赣公路西进,4月2日,高安失陷,俞济时第74军退守高安以西和锦江南岸。薛岳见日军西犯势头方炽,已威胁到湘赣边境,严令第一线官兵“无论如何激烈,伤亡如何重大”,“亦必须确保百丈峰至新余、上高、宜丰及清江、分宜、宜春、万载各要点”,防止日军进入湖南。他警告前线将领如果作战不力,“如此必陷我湘北及赣西北部部队于艰苦,须知本战区兵力占国军四分之一以上,如本战区惨败,不仅湘赣灭亡,恐尔后国军即无力抗战”。^③鉴于南昌保卫战中,一些高级将领远离前线有误战机,4月2日,蒋介石特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均须亲赴前线督战。高安失守后,第106师团已无余力西犯,江西战场的形势复趋平稳。日军以为大功告成,便由南昌一带撤走不少军队,没

① 《第9战区南昌武宁会战各部队伤亡百分比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25页。

③ 《第9战区四月份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有料到中国军队在新败之余,又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

4月上旬,军事委员会要求各战区分别发动春季攻势(也称四月攻势),第3、第9战区奉命协力反攻南昌。4月19日,罗卓英根据军事委员会下达的以主力截断南浔路、再以奇兵由赣江以东攻击南昌的指示,^①进行了具体部署。

担负截断南浔路的部队为第1集团军和第74军。第1集团军攻击南昌西北地区,主力由安义、奉新西侧向乐化、永修间南浔路挺进,截断南昌之敌与长江方面之敌的联系,相机攻掠安义、奉新、靖安等要地,孤立南昌。第74军攻击南昌西南地区,由高安以西及锦江南岸经大城、万寿宫向牛行、乐化间南浔线挺进,彻底破坏交通,直接协助攻打南昌。

负有奇袭南昌使命的是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这支部队为第3战区主力,暂时拨归第9战区统一指挥。罗卓英令上官云相部以一部兵力由南昌以东的武溪市、谢埠市一带湖沼地区潜进,向南昌城厢周围袭击,另以两师兵力由抚河、赣江自南向北攻,相机占领南昌。

正在整理中的第19集团军以主力扼守赣江以南与抚河之间地区,第49军刘多荃部以一部攻击锦江北岸及生米街附近的日军,主力留作总预备队。

4月21日,第74军主力由高安以西,另一部由高邮市至石头岗间渡过锦江,分头攻击高安、大城、万寿宫一带日军。第49军一部渡过锦江,攻击生米街附近日军,揭开了反攻南昌的序幕。

4月22日,战斗全面展开。

西山万寿宫处于锦江与赣江合流的三角地带,扼高安与奉新

^① 《攻略南昌计划》(1939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间公路交通的咽喉,是攻守南昌的战略要地。日军在西山万寿宫设有一所兵站,储存着大量粮草、弹药、汽油。4月21日起,俞济时第74军一部就开始围攻西山,但日军不断增援,俞军一直未能得手。西山万寿宫及其北部的奉新等地构成日军在南昌外围的坚固据点。

23日,俞军第51师一度攻入高安,至26日终将其完全占领,进而克复祥符观。同时,第57师占领大块、鼓楼铺,第49军占领石头岗、生米街,第105师攻克了高邮市。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一时阵线大乱,几濒崩溃。第106师团一部集中西山万寿宫和虬岭死守,并不断反击,企图将中国军队逐出大城和生米街,均未得逞。27日,第74军各部继续推进,向奉新东南的虬岭、赤土街攻击。可惜北面的第1集团军未能取得重大进展,致使第74军受到奉新方面日军的牵制,未能按预定计划挺进南浔沿线。只有预9师5月7日曾一度突入牛行,由于兵力过于单薄,俞军主力未能跟进,而进攻南昌的上官云相部复遭受严重挫折,日军得以自由转用兵力增援牛行方面,使中方已无暇切断南浔线。

4月22日,第1集团军第184师和新10师攻击奉新、靖安以西日军阵地,另以新11师向靖安以北滩溪市挺进。24日,第184师和新10师占领了奉新西南及南部的凤凰、桃仙岭、鸦鹄岭一带高地,一部则在奉新以西及西北与日军交火,形成三面包围奉新城的局面。日军伤亡甚重,固守孤城。而新11师行动敏捷飘忽,已进至靖安以西的螺丝岭,令日军大为惊恐。27日,日军一联队增援奉新,双方在奉新周围胶着。第1集团军和第74军等一样,未能按预定部署切断南浔路。

在反攻南昌的战斗中,上官云相第32集团军方面的战事最为紧张激烈。4月19日,上官云相令熟悉南昌附近地形的预5师选编约一团人数的便衣队,限于24日前混进南昌城,策动城市民众,

作攻击部队的内应。第 79 师作为突袭南昌的主力集结于梁家渡以北地区待命,第 26 师接替第 79 师原防区,配合第 79 师攻击南昌。

4 月 23 日,何平指挥第 16 师和预 10 师以一部沿江东岸,主力沿赣粤铁路及闽赣公路两侧向北前进,进展顺利,中午击溃市汉街之敌,24 日占领新村圩及两梁山。25 日、26 日由璜溪市向向塘攻击,一路披靡,直扑南昌东南郊。

负有主攻重任的第 79 师于 23 日由武阳、谢埠市渡过抚河。预 5 师便衣队也于 24 日、25 日晚陆续潜入南昌市区。26 日,第 79 师进抵冈下、吴村,一部攻击莲塘日军,预 5 师一部已抵达南昌机场附近。第 101 师团一时无法遏制中国军队潮水般的攻势,便衣队且在城内起事,市内数处起火,并发生巷战。日军一日数惊,可惜第 79 师主力未能跟进,便衣队被逼出城外。

由于第 1 集团军与第 74 军未能达成切断南浔铁路的任务,南昌日军得到从长江方面增援的海军陆战队及第 116 师团一部的支援。27 日,第 101 师团以海军陆战队为守城主力,而将兵力集中反攻,利用优势的空军猛烈轰炸中方阵地,双方在南昌东南及正南郊约 10 公里以内地区展开将近一周的争夺战,结果日军重新控制了沈口、棠溪、谢埠市、莲塘、向塘、西凉山、璜溪市等要点。

5 月 1 日,蒋介石传令攻城部队须于 5 日前攻占南昌。各路将士再兴攻势。2 日,第 102 师占向塘,翌日复攻克市汉街。3 日,预 5 师、第 79 师与新投入攻击的第 26 师由武陵渡及瑶湖两岸各地向南昌进逼。5 日,重占飞机场,前锋已进至南昌城东金盘路附近,主力则在莲塘附近与敌激战。

中国军队越是迫近南昌城,越是无法避免攻坚,主攻部队早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正面强攻。预 9 师第 39 团奉命攻占樊家山,5 月 2 日晨全线出击,到夜间虽已突破两道铁丝网,但最后还是未能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奏效,且伤亡严重。7日,第101师团在重炮和飞机的协同下发动反击,前来增援的第116师团也在近郊加入反攻,并从莲塘等方面夹击第26师等部。战况之惨烈远过以往。第79师师长段朗如畏怯不前,致使第26师孤军奋战。7日下午,第29军军长陈安宝、第26师师长刘雨卿亲赴前线督战。陈安宝在姚庄腹部中弹殉国,刘雨卿身负重伤,军心亦为之动摇,遂退往抚河东岸的梁家渡、天主渡、市汊街一线。

反攻将临尾声之时,薛岳对蒋介石限期攻占南昌的命令难以赞同,又不便直接向蒋进言,5月3日,他致电陈诚表示:“现时已持久,攻坚既不可能,击虚又不可得,敌势虽蹙,但欲求5月5日前攻至南昌,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①请陈诚将此意向蒋介石婉为陈述。6日,陈诚将薛岳的意见电告蒋介石。此时,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也认为,“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方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南昌方面,以兵力三分之一继续围攻,三分之二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实际则变换攻击目的”。^②7日,陈安宝军长阵亡及攻城部队在日军反击下受挫的消息转到重庆,蒋介石只得于5月9日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日军也未有进一步反攻的行动。

反攻南昌虽未能成功,但确实表露了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除个别将领外,参与反攻的指挥官尚能执行上级的战斗命令,陈安宝等以身殉职。下级官兵的斗志也颇为旺盛。但蒋介石决定反攻南昌的目的不是歼灭日军一部有生力

① 《陈诚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9年5月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量,而是以夺取南昌城为主要目的,甚至在攻击失去奇袭性质后仍固执己见,忽略了己方军队缺乏炮兵且不擅长攻坚的局限性。全力围攻高垒深池的南昌城的结果是难免在日军步炮空联合反击下受挫。

三、随枣会战

从战略形势上看,日第 11 军虽占据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地区,但仍然处于中国第 5、第 9 战区外线包围之中。为改变不利的战略态势,1939 年 2 月下旬开始,日军沿京(山)钟(祥)路、汉(口)宜(城)路西犯第 5 战区,与第 5 战区右翼集团军张自忠部激战,占领了钟祥等地。3 月初,日军沿安陆、长寿店、汉口镇一线与中国军队对峙。3 月中旬开始,第 11 军转而攻击南昌,从而解除了来自东南侧的一大威胁。

第 5 战区辖有鄂北、鄂西、鄂豫皖边境地区,拥兵 40 余师,不过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战区直辖炮兵也在武汉会战撤退时损失殆尽。不过,第 5 战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以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 5 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汉口—宜昌),一为襄花路(花园—襄阳),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兵家必争要地。1939 年 4 月上旬,第 5 战区发动 4 月攻势,从东西两面频频扰袭平汉线南段,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军事委员会为加强第 5 战区的实力,将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 6 个师从湘北移往枣阳,令日军有锋芒在背之感。第 11 军决定深入第 5 战区,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来自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

从 4 月中旬开始,日第 11 军调兵遣将,将第 3、第 13、第 16 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团、骑兵第4旅团等部队向钟祥、安陆、应山一线集结,至下旬集结完毕。日军作战的目标是在枣阳一带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而不考虑占领城镇,^①其具体方案是,以第3师团等部将第5战区主力吸引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枣阳一带,左翼由钟祥汉水向北突进,切断中国军队向襄阳方面的退路,并向北迂回包围,另一部由信阳进逼桐柏,切断中国军队向北的退路,然后围歼于枣阳向东北地区。简单而言,就是运用“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的战术。日军为了攻击奏效,配备了大量的火炮、战车和飞机。

4月下旬,军事委员会侦知日军从长江下游抽调第33、第34师团兵力编入第1军,判断日军将向第5战区发动攻势,立即电令第5战区准备应战,要求第1、第3、第9战区牵制当面日军,策应第5战区作战。25日,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停止四月攻势,积极备战。根据第5战区的请求,军事委员会电令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率部协助第5战区作战,第2集团军驻临汝的第30师及郾城的第44旅兼程向桐柏集中,第27、第31师迅速向南阳靠拢。

4月30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达战斗命令:“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战容易。”^②根据部署,第5战区所部区分为左集团军、右集团军、江防军、第二线兵团及鄂豫皖边区游击总部。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下辖王缙绪第29集团军(辖廖震第44、许济宗第67军)、张自忠第33集团军(辖张自忠第59军、冯治安第77军、曹福林第55军),任务是沿汉水两岸布防,尤其是加强襄河东岸部队,阻击日军北上和渡河。左集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2分册,第132页。

^② 《第5战区作战命令》,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下辖第 11 集团军(辖陈鼎勋第 39 军、覃连芳第 84 军)、汤恩伯第 31 集团军(辖张轸第 13 军、王仲廉第 85 军),任务是在随县附近守备现有阵地,阻止日军西进,将主力控制左翼,相机向日军侧背攻击。江防军司令郭忏下辖萧之楚第 26 军、周岳第 75 军、郭忏第 95 军等部,任务是负责江防,并沿汉宜公路布防。一部渡过襄河的归口沙洋一线牵制日军主力。第二线兵团为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下辖第 41、第 45 军,作为预备队,策应左、右集团军作战。鄂豫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廖磊下辖欧寿年第 48 军、张淦第 7 军等,负责向信阳、花园、平汉路段东侧和武汉周围游击牵制日军。第 1 战区孙连仲部则在桐柏山北麓的明港、桐柏一线布防、掩护第 5 战区左侧背。

5 月 1 日拂晓,日军发起全面攻击,汉水沿岸、大洪山外翼至随县附近的第一线阵地完全进入战斗状态。日军分兵,一路以第 13、第 16 师为主力,由钟祥等地攻击汉水沿岸及大洪山西麓阵地,试图沿襄河、大洪山地区北犯枣阳。另一路以第 3 师团的主力,由应山西进,向随县城南北两侧地区进攻。一部日军则在沙洋一带佯攻。

在左集团军方面,防御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防守部队分别为第 41 军长寿店—客坡店一线,第 39 军洛阳店地区、第 84 军淅河镇地区,第 45 军吴家店—游河一线,汤恩伯集团军作为第二线兵团位于桐柏山区。5 月 1 日,日第 3 师团主力向第 84 军防守的淅河一线发起攻势,覃连芳第 84 军在蒋家河、塔儿湾阵地上坚守。数日间,塔儿湾阵地失而复得达 7 次之多,日军付出重大伤亡后于 4 日占领塔儿湾,第 84 军第 173 师、第 174 师西退竹林湾、高庙坡阵地继续抵抗。第 31 集团军第 13 军张轸部防守随县东北的高城、殷家店一线,血战数日后,于 6 月被迫放弃阵地,退守漂河西岸。第 45 军利用大洪山外侧阵地抵抗第 13 师团的进犯,其后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军退往大洪山主阵地,顽强抵抗。至5月8日,左集团军守御的前沿阵地仅局部在变动,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

右集团军的骨干为第33集团军,该兵团在1939年2至4月于京山、钟祥地区与日军多次恶战后,实力大损。自5月1日日军进攻后,张自忠总司令以第59、第77军主力防备襄河东岸及大洪山西翼阵地,以第55军、第67军担任河防之责。从5日起,日军第16师团等全线猛攻,6日,突破守军在长寿店、丰乐河一线的主阵地,右集团军退向马家集以北,日军跟踪北上,汉水东岸已是门户洞开。张自忠令第77军冯治安部在襄河东岸侧击日军,3月8日后,张自忠亲率第38师等部东流襄河,竭力袭扰由钟祥北上的日军主力,歼灭日军400余人,截断了日军后方补给线。日军竟不顾侧面受攻与后路被断之险,主力对付侧面的中国军队,其快速部队则向北猛进。第5战区长官部急派第22集团军第41军一师从襄阳驰赴宜城以东布防,但仍未挡住日军进攻势头。7日,日军攻陷枣阳,8日,日骑兵第4旅团控制了襄花公路上的张家集和双沟镇,切断襄花公路,切断了左集团军的后方联络。

由于日军第13、第16师团等主力沿襄河东岸突进,迂回左集团军西去退路,左集团军顿感腹背受敌,第84军自8日晚开始转移行动,撤向唐县镇,向唐河、白河一带转移,沿途受到日军追击,损失颇重。第39军刘和鼎部则奉命留守大洪山游击。第45军则在茅茨畈一线与日军激战后,接获左翼兵团李品仙总司令命令,乘夜色逐次北撤,经由唐河、白河,开往襄樊。日军在完成两翼包围后将作战重点置于捕捉第31集团军主力,以歼灭这一机动兵团,遂以主力遮断汤集团军向西的退路,由唐河左岸向东北突进,信阳出发的第3师团铃木支队则首先攻克桐柏,切断了汤集团军向北撤退的路线。第3和第13师团主力则由随枣方面向汤部大举进攻。8月8日,汤军退向唐河。9日,日军第3师团一部在20余辆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1939年冬季攻势

战车掩护下,自天河口向江头店第85军王仲廉部猛攻,激战竟日,日军仍未突破守军阵地。战至10日,第31集团军早已处境危殆,日军将完成合围。汤集团军已无固守阵地的必要,汤恩伯决定钻出日军的包围圈,从内线转向外线,遂令第13军两个师留守桐柏山担任游击,掩护主力撤退,自己则率4个师向唐河转移,途中因受日军快速部队袭击,部队被分成数段,遭受一定损失。12日,日军乘中方秩序混乱之际,占据了唐河和桐柏,幸好第2集团军第38军第119师在桐柏以东地区阻止日军追击达6天之久,汤集团军才于15日顺利退向泌阳。

5月9日,第5战区长官部因受沿汉水北进日军威胁,从襄阳匆忙迁往石花街。从9日至12日,战区长官部与各集团军一度失去通讯联络,各部均独立作战,或直接受天水行营指挥。其间,右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决心坚定,始终率部背临汉水向东侧击日军,毙日军数千人,克复丰乐河等地,切断了长寿店以南交通。第5战区主力大部退往光化一带整理,一部则退往豫南。

鉴于第5战区主力已转移至外线,日军合围计划已失败而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日军已达成消耗第5战区实力的任务,开始南撤,并乘势围攻在大洪山、桐柏山中游击的中国军队。为了反守为攻,李宗仁提出了反攻计划:“第5战区目前已成外线作战有利态势,且掌握汉水东岸地区有利地形,似应乘机先以河防两、三师向汉(口)宜(城)、京(山)钟(祥)两路出击,牵制襄花路方面之敌,尔后第5战区左右集团军全线开始反攻。”^①5月10日,军事委员会电令第5战区,令孙连仲率部推进至新野、邓县策应第5战区,汤恩伯部队以南阳后方,会同孙连仲部固守汉中,张自忠退向汉水西边的南漳一带游击,孙震部担负襄樊一线游击,这就是说,军事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第112-113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委员会已准备放弃襄河以东地区。^① 14日,汤集团军会合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自豫西南下,收复唐河。16日,刘汝明第68军第119师克复桐柏。至18日晚,日军开始全线总退却,后退200多公里。中国军队尾随跟踪,19日克枣阳,23日占领随县,日军重新退回钟祥、应山等地据守。

随枣战役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一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随枣地区。在会战中,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守军阵地,突进至滚河一线,完成一翼包围,但其它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使第5战区主力得以逸出包围圈。尽管第5战区主力在战役中遭受相当损失,但日军也死伤13000人,可说是得不偿失。

第三节 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政府认为英美法诸国将更无力顾及中国,正是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好时机,首相阿部于9月4日发表声明,称“帝国不介入欧战,一意向解决中国事变迈进”。^② 为加速对华侵略的步伐,统一在华的政略、战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撤销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新设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帅全部在华陆军部队。

^① 《随枣会战》,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抗日御侮》第2卷,第458页。

9月12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总司令官由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担任,参谋长由前陆相板垣征四郎中将担任。9月23日,日本大本营正式发布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命令,规定华北方面军、驻武汉的第11军、驻京沪的第13军、驻广州的第21军统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指挥。大本营授予中国派遣军的基本任务是:“应尽力摧毁敌继续作战之企图,并迅速根据形势变化增强对第三国之战备。”依据此制定了7项具体任务如下:

(1)大致确保西苏尼特王府、百灵庙、安北、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地域之安定,尤应首先恢复蒙疆地区、山西省北部、河北省及山东省各地域,以及上海、南京域之治安。

(2)确保自岳州起至长江下游之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企图。其作战地域大致应为安庆、信阳、岳州、南昌之间。

(3)占据广州附近、汕头附近以及海南岛北部要域,切断敌之南方补给路线,广州附近之作战域大致应为惠州、从化、清远、北江以及自三水起至西江下游之间。

(4)超越上述各项地域作战,须待另行命令。

(5)应适时实施航空进攻作战,压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并防止敌空军之再建。

(6)上述各项作战,关于在海岸、水域之作战以及航空进攻作战应与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密切协作。

(7)为了促进抗日势力之衰亡,应加强有效的谋略压力。^①

上述各项任务从1939年10月1日零时开始执行。

尽管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名义上统辖关东军以外的全部驻华日军,然而大本营的命令又规定,华北方面军、第21军只在作战和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第49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政务大纲方面归派遣军总司令掌握,其他方面有自主权。而第13军又主要负责京沪地区的治安,所以,日本中国派遣军中只有驻武汉的第11军是纯粹以消灭中国抗日有生力量为主要任务的野战部队。这也预示着未来正面战场战斗将主要集中在武汉附近地区,第11军将成为中国军队的劲敌。

在变更指挥系统的同时,日军对其在华部队的编制也作了调整,除武汉及华南地区外,逐步以主要用于警备的新制师团(由3个步兵联队和骑兵、炮兵、工兵、重兵各1个联队组成)和独立混成旅团取代主要用于野战的旧制师团(由两旅团四联队组成)。旧制师团调回国休整,以为将来的南进或北进作战之用。^①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建立,表明日军想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加速“中国事变”的解决,但总体战略仍以占领武汉、广州后确定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以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相结合的方针,军事上以确保占领地的安全为主,同时相机消灭中国主力部队。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成立,中国方面曾“一时为之震动”。^②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建立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便是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

二、日军发动“湘赣作战”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在1939年9月初制定了旨在消灭中国第9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立即将其定为“湘赣作战”的计划付诸实施。

这次军事进攻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政治上,为汪精卫叛国集团

^① 《抗日御侮》第2卷,第30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9月,第5页。

撑腰打气,在华中地区“树立(汪伪)中央政权的气势”,以促进亲日伪政权的尽早建立;^①经济上,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谚语,湖南是战时中方粮食、物资和兵员供应地,日军占领此地区既可扩大经济掠夺,又可威胁中国军队补给线。自然,日军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军事方面。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重要党政军机关及工厂的西迁,大多是经长沙而完成的,不少军政机关还曾在长沙办公。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成了正面战场上与敌军对峙的最重要城市,屏蔽西南诸省的门户,战略地位益显突出。中国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派驻了大量部队,负责该区防务的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改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军政事务由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负责)下辖 52 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兵力之多,居当时中国各战区之首。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成立,第 11 军就选在长沙附近作战,企图既歼灭中方野战主力,消除武汉周围的威胁,又炫耀中国派遣军的实力,压迫中方投降。此外,当时第 9 战区宣称将发动“九月攻势”,日军要先发制人,争取战场主动权。

1939 年 9 月 1 日,冈村宁次制定了作战计划,以“吕集作命第 343 号”下达给参战各师团,命令称“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 9 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 9 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②可见日军是以打击中国主力军而不是占领长沙为主要目的。为便于作战,冈村宁次于 9 月 13 日将第 11 军指挥所从武汉迁往咸宁。第 6、第 33、第 103、第 106 等 4 个师团的全部及其他部队约 10 万人也集结完毕,准备在海空军配合下发动进攻。日军依预定作战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书局 1985 年 9 月,第 4 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书局 1985 年 9 月,第 4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区域将会战定名为“湘赣会战”。中方则称之为“长沙会战”(亦称“湘北会战”)。

中国第9战区负责湖南全省和湖北部分地区的作战,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战区最主要的任务是长沙不失,长沙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其北部的地势却是由湖滨冲击而成的,比较平坦,无险可守,故又是战略家所称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武汉失陷后,中国有官员认为长沙弃守势在必然,准备实行“焦土抗战”,结果,日军尚未入侵便惊慌失措,竟满城放火,酿成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蒋介石盛怒之下,下令枪毙了负责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职;同时调派其亲信薛岳赴湖南主持军政,勉励要建功立业。

薛岳履任后,与参谋人员研究地形时,认为长沙以北无险可作防守之助,若仅凭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显然不足抵抗日军,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为转兵之用,潜力颇大。薛岳等据此制定了一套号称“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方法,作为未来湘北会战的指导。其要领是,一旦日军来攻,以部分部队坚守既设正面阵地,予敌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侧翼山地,继续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待敌人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使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敌人一举围歼。^①“天炉战”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

尽管长沙战略地位很重要,但因其地势所限,守之不易,故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在该城的弃守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蒋介石在

^① 陈寿恒等编著:《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8年12月,第335页。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1939 年 4 月致电薛岳等人,指出一旦日军在湘北进攻,“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应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则起而予其制命之反攻,如能布置精密,运用得当,必可取得最大之胜利”,有放弃长沙的打算。^①然而,4 个月后,蒋又命令薛岳须固守长沙,指示“长沙核心工事,应即加强。先作一师兵力配备之阵地,并作固守二星期时间之准备,则长沙可永不失守,不可以兵力单薄则不能守也”。^②薛岳等人立足于战,制定了未来湘北作战的基本方针:“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之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突入第二线阵地(平江与汨罗江线)时,我军应以幕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之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应乘其消耗既大、立足未稳之际,以预伏置于长沙附近及以东地区之部队,内外夹击,予敌以致命打击。”^③9 月上旬,第 9 战区侦知日军在湘北等处集结兵力,估计敌人有进攻长沙的可能,下令各部队,一旦日军来攻,要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然后“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④各部队调整部署,加固工事,准备作战,尤其注意对交通线的破坏,不仅毁坏铁路、公路,就是乡间小路也动员民工挖窄,“稻田全犁翻放水”,以限制日军机动性强的优势和重武器的使用。从双方的战前部署看,是针锋相对,都是要消灭对方主力,决战地点也均选在长沙以北地区,只是日方希望决战尽早实现,而中方则想决战前多消耗敌人,只有在敌人消耗很大的情况下才进行决战。

① 《蒋介石致薛岳陈诚手令》(1939 年 4 月 15 日),载《作战经过(二)》,第 433 页。

② 《蒋介石致薛岳手令》(1939 年 8 月 27 日),载《作战经过(二)》,第 434 页。

③ 《抗日御侮》第 2 卷,第 172 页。

④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战争迫在眉睫,中方在长沙的弃与守问题上的争论尚未结束,薛岳等前线将领主张守,而白崇禧等高级幕僚人员倾向弃。战前,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到株洲,要求薛岳弃守长沙以北地区,把部队后撤至醴陵、衡山、湘潭一线。薛岳力陈守长沙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坚持己见,并以“战败,则我必自杀以谢天下苍生”作誓。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最后薛岳在9月15日深夜向宋美龄电话报告,“声泪俱下”地陈述理由,并说:“我以个人生命作保证,一定以血肉保卫长沙”,以死报效蒋介石。^①主张保卫长沙的意见遂为最高当局采纳。

9月14日,驻赣西奉新附近的日军第106师团与第101师团一部首先向会埠中国第184师阵地进攻,揭开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序幕。会战过程中,日军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其主力配置于湘北,赣西、鄂南属于策应性作战。

9月18日,日军集中了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及海军陆战队的一部分共5万人,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向新墙河以北的中国张耀明第52军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中方守卫湘北的是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官兵本着逐次抵抗、消耗敌人的方针,顽强作战。最初几天,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不少阵地几经肉搏易手,“失而复得者数次”。^②在草鞋岭阵地,中国守军战至仅剩一名新兵,仍不退却。^③至22日,第52军被迫撤退到河南岸,新墙河以北的地区完全被日军占领。

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团5000多人在80余门重炮的猛烈

①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41页。

② 《关麟征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578页。

炮火支持下,强渡新墙河。中国守军乘敌人行至河中央时,轻重火器齐发,日军死伤无数,联队长山村治雄被击毙。日军先后 8 次渡河,均未成功,“乃以气球升空俯瞰,导重炮远击,毒气烟幕弥漫如云出岫,飞机 13(架)游弋掷弹,步兵五六千乘时强渡,我军浴血杀敌,浮尸满河,水流遽塞”。^① 中国士兵中毒阵亡者甚多,日军最后渡过新墙河。

日军在正面渡河作战的同时,又以上村支队一部在海军支援下,从洞庭湖东岸登陆,准备腰袭坚守新墙河一线的中国军队。23 日晨,上村支队在汨罗江口附近的营田等处登陆。中方罗奇第 95 师戒备不严,加之日军事先施放了烟雾,直到敌人上岸才仓促应战。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攻中方阵地,并施放毒气。洞庭湖岸多为沼泽地带,重型地面武器难以使用,日军使用飞机狂轰滥炸,为地面部队开路。“营田为之炸为焦土,营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② 中国虽数次派去援兵,终因敌方火力太猛,“伤亡过大,营田遂失守”。^③

中方守军的侧翼因日军在营田等处登陆成功而受到严重威胁,新墙河防线已有被日军南北夹击的危险,难以再守。23 日,第 9 战区要求各部队“于新墙、汨罗两河间地区予敌彻底打击,以减耗敌之战斗力”,“达成消耗目的后,转移预定地区,续求消耗,不求一地得失”。^④ 从 24 日开始,第 15 集团军主力便撤向汨罗江南岸的第二道防线。至此,中国军队构筑一年之久的新墙河防线完全

①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 348 页。

② 第 9 战区司令长官部编纂组:《长沙会战纪实》,第 89 页。

③ 《关麟征致蒋介石密电》(1939 年 9 月 23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被敌人突破。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仍判断敌方目的在于攻占长沙,25日命令第9战区,湘北作战应“保持幕阜山根据地,袭敌侧后,敌如真面目进攻长沙时,在铁道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以有力部队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情况该战区主力应依次转移至株州、浏阳、醴陵地区”。^①第9战区随即将兵力向长沙及其以东地区集中。

25日、26日两天,日军在大量飞机的掩护下,强渡汨罗江,攻击设在汨罗江南岸的中方第二道防线,遭中国军队顽强阻击,激战竟日,迭次受挫,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从9月18日开始,双方在新墙河、汨罗江两岸血战9天,日军突破中方两道防线,占领了湘北不少城镇,但在到达预定的决战区域前,人员伤亡、物资消耗都已很大,对日后的作战影响很大。

三、决战未成 湘北日军回撤

汨罗江两岸的攻防战尚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认定日军必占长沙,决定即使长沙不守也要相机在其附近地区予敌以重击。26日电令第9战区:“准备以六师兵力,位置长沙附近,由薛长官亲自指挥,袭击向长沙方面突进之敌,予以严重打击。”^②薛岳据此制定了《在长沙以北地区诱敌歼灭战之指导方案》,将战区部队分为正面部队、伏击部队两种,分别负责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区和围歼敌人,作战指导方案确定:“战区以一部埋伏于福临铺、桥头驿附近及

①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介石致薛岳电》(1939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其以北地区,以有力部队控制于金井及福临铺以东地区,俟敌进入伏击区域,突起包围敌人而歼灭之。”^① 9月27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南迁衡阳,薛岳则带少数幕僚到株洲设立指挥部,战区各部队纷纷按指定位置重新集结,准备在长沙周围与敌人决战。

27日下午,日军第6师团先头部队约1000人南下进攻福临铺。覃异之第195师已在长沙以北筑起新的防线,选择背山面水的有利地形,埋伏重兵,再派小股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吸引敌人追赶。日军上当进入伏击圈,等到中国士兵万枪齐放,猛烈射击时,措手不及,当场毙命者500余人。^② 日军立即派兵增援,双方又在福临铺一带展开拉锯战。日军为迅速突破防线,用炮火猛轰中方阵地,并倾全力攻击一点。日军在激烈混战后占领福临铺,第195师又向南撤至上杉市布防。30日,第6师团从福临铺向上杉市进攻,再遭伏击,伤亡700余人。

30日,日军一部攻破中国在捞刀河的防御阵地,直扑仅距长沙以北30公里的永安市,在与中国张汉初第25师激战后占领该市。这是日军自湘北南侵所达的最远点。同一天,日军奈良支队已沿汨罗江东侵,攻占了平江,并和自鄂南而下、从东北方向威逼长沙的第33师团主力会合于三眼桥。

至此,日军的三条战线中已有两条汇合起来,进军的直线距离达130公里以上,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为其侵占。但作战过程中,不时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伏击,已耗时近半月,战力损失也颇重。而且中国军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战术,既不轻易放弃

^①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长沙会战纪实》,第104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阵地,又不固定死守,且战且退。日军战前所订“以期在最短时间捕捉敌军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江及修水周围地区”的目标,在时限上和地域上,都已无法实现。同时,日军又侦知大量中国军队正在向长沙集结,有围歼日军的企图。^①从赣南、鄂北进攻,策应湘北战场的另两路日军也受到中国军队的不断阻击。冈村宁次决定停止攻击,撤回原驻防地。

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筹划退却。当天,侵占永安市的日军退回捞刀河北岸。双方进退态势开始转换,会战进入新的阶段。

就在日军退却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把第6战区的防卫区域一划为二:以湘江为界,湘江以东归第9战区,薛岳为司令长官;湘江以西归第6战区,陈诚为司令长官。^②薛岳正式成为战区司令长官,但因会战的几个战场均在湘江以东,故这次战区的重新划分对战斗结果没有什么影响。

2日,与敌人交战多日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战术的变化,在断定日军确实是在退却后,他命令所辖各部改变与敌人在长沙附近决战的配置,转为追击阵形,并确定以汨罗江南岸为第一步追击目标。当天下午,正从上杉市回撤的日军6000人遭中国第195师夹击,“死伤甚多,残部向福临铺溃窜”。^③次日,第195师和第25师追击到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又向汨罗江北岸退却。汇合于平江以东地区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遇到中方杨森第27集团军的抗击,不再恋战,分路回撤。奈良支队向南江桥一带退却,第33师团经长乐街退回原阵地。4日,第15

① 《长沙作战》,第4页。

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集团军各路追击部队尾随日军之后,先后收复安定桥、新市、营田等地。

冈村宁次于 5 日下令日军全线撤退,命令称中国军队已潜伏于汨罗江、修水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力之恢复,并严密注意华军之追击”。^①这一命令是由飞机空投的,飞机被中国士兵击落,内容也为中方获知。薛岳立即向各部队发出命令:“湘北正面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他要求已深入敌后的挺进部队破坏交通线,阻止日军退却计划的实施,追击部队要赶到敌人前面去,力行“超越追击”。^②

中国各军虽接到“超越追击”的命令,但害怕日军是佯退,会突然反攻,加上前线各军已与敌军鏖战旬日,损耗很重,所以都未能突到日军前面,奋力歼敌,而只是远远地尾随日军之后,收复失地。因而日军的撤退进行得十分顺利。6 日,第 6 师团和奈良支队已分别退向新墙河、南江桥,中国部队才到达平江附近,速度最快的是第 195 师,其挺进部队也刚渡过汨罗江,主力仍在南岸,和日军隔着相当的距离。

8 日,日军全部渡过新墙河,重回北岸,第 195 师抵达新墙河南岸,收复了鹿角、荣家湾、新墙、杨林街等重要据点,“并派一部渡新墙河搜索”。^③到 10 月 10 日,中日双方在湘北地区又各自回到 9 月 18 日日军发动进攻前的阵地,仍是隔新墙河对峙。

① 《长沙会战纪实》,第 35 页。

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四、赣北及湘鄂赣边区的作战

赣北、湘鄂赣边区是第一次长沙会战的另外两个战场。

在赣北,中日双方相持于靖安、奉新、高安一线。日军配备于该线的是第101师团、第106师团,中方负责该区防务的是卢汉第1集团军、罗卓英第19集团军,作战事务由罗卓英统一指挥。军事委员会曾在5月向第9战区指示未来赣北的作战方针为:“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诱敌深入而侧击之。”^①

9月14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2000人,向会埠以北的中国万保邦第184师进攻,守军经抵抗后即向会埠撤退。赣北方面的作战和整个第一次长沙会战由此开始。

中国方面综合各种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日军在赣北的进攻主要目的是配合湘北主战场,“以欺骗我军,使我部队向该方面转移”。^② 目的在于分散中国军队的兵力,相机消灭其当面的中国军队,且可与湘北日军配合,从东西两面夹击第9战区主力。罗卓英决定,“为掩护战区之作战右侧安全,准备攻击该敌之目的”,^③ 并对现有部队的配置作了调整。

赣北方面的战斗,主要由对高安的争夺和在会埠至甘坊一带的激战组成。

15日,日军第106师团又突破了第184师的防御阵地,一路转而向南,直奔战略要地高安。至18日,日军完全占领了高安附

① 《抗日御侮》第2卷,第172页。

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近的村前街、斜桥、祥符观,从三面包围了高安,并和已占领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中国第 60 军(军长安恩溥)、第 58 军(军长孙渡)的围击圈。孙、安两军为避免被歼厄运,奋力拼杀突围,退至宜丰、凌江口一线。

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不成,便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高安。中方守军李兆瑛第 139 师虽经抵抗,但不敌日军的猛攻,19 日退出高安。由于高安在双方的战略运用上都有重要作用,是必争之地,故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立即电令罗卓英,要以攻为守,“予敌以重大打击,恢复高安”。^① 第 9 战区更在战前就命令,“高安万不可放弃”。^② 所以,中方迅速组织反攻高安。第 9 战区将战区直辖的王耀武第 74 军用于高安方面,该军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之一,战斗力较强,到达指定位置后,即派李天霞第 51 师、陈式正第 58 师攻打高安附近的据点,切断日军退路,和第 32 军一起逐渐形成对高安的反包围。

19 日晚,中方反攻高安,第 51 师首先收复村前街。21 日夜,第 139 师乘夜色渡过锦江,驱赶石鼓岭等处之日军。22 日拂晓,中国军队全面反攻高安,由第 139 师、第 141 师(师长唐永良)担任主攻。“高安城垣先为我军拆毁,故此际敌亦无法固守,经我某部反复冲锋,敌守城部队伤亡过半,我仍于 21 日辰时克复高安”。^③ 而后中国军队又派兵向北向东追击撤退之敌,先后收复黄坡桥、祥符观、司公山等处,恢复了 14 日敌人进攻前的阵地。

当高安争夺战激烈进行之时,日军第 106 师团主力从奉新出

① 《白崇禧致蒋介石密电》(1939 年 9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长沙会战纪实》,第 24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动,经会埠西侵。9月23日在上富镇附近与权宏光第183师、汪之斌第15师发生战斗,凭借优势火力和毒气,打开了西行的通道。第6师团执意西行,攻占了横桥、甘坊,目的是要和从通城南下的第33师团协力围剿正在渣津、修水一带作战的中国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第30军(总司令王陵基)。

中国军队为粉碎敌军企图,消耗其战力,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向甘坊反击。第184、第15、第183师分别从南、西和西北三面围攻甘坊。同时,中方又攻下上富,切断了敌军回路。27日,中国军队发动总攻,战况异常激烈,“在甘反复肉搏,不下数次”。日军被首尾截击,“处处受创”。^①日军顽强防守,一度保住甘坊不失,但其主力也被牵制在甘坊附近,脱身不得。

被围在甘坊、横桥的日军第6师团不顾退路切断,一意西行,9月3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冲击中国军队包围圈的结合部,从第183师的阵地冲开缺口(师长杨宏光战后因此受到处分)。10月3日,日军连续攻下大街、石街。这时湘北日军已经开始反转,第106师团又受到中国第15师等的阻击,便迅速停止攻势,经沙窝垌向武宁方向退败。此时中国军队虽已在敌人前后形成夹击态势,可是日军战力仍强,4日,中国士兵组成奋勇队出甘坊追击北窜之敌,有30人“冲入厚田街之铁丝网,敌猛射,全部牺牲,敌旋施放毒气,我官兵中毒者颇多”。^②5日,薛岳命令罗卓英乘势全歼敌第106师团,蒋介石也电令王陵基:“积极攻击当面之敌,以行牵制

①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罗卓英致蒋介石密电》(1939年10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而利全局。”^① 但同湘北的情况一样,敌军的后撤速度极快,中国军队只能跟在后面收复失地。10月12日,赣北日军分别撤回其在武宁、奉新、靖安的据点,赣北战火平息。

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第3个战场最后开战的是湘鄂赣边区。

9月21日,驻鄂南通城的日军第33师团攻击中国李棠第140师在米山等地的阵地,几天内即南下占领了麦市、龙门厂等战略要地,战火延至湘鄂赣边区。日军的企图是从东边避开中方利用河流构筑的防线,同湘北日军夹击第15集团军于平江地区。

9月底,第9战区决心歼灭由鄂南出发的敌军,以保证湘北方面的作战。29日,战区向第20军军长杨汉域、第79军军长夏楚中下令,要求他们将敌33师团阻击于嘉义以北,命令称“如该两军作战不利,使敌窜过以西以南,影响湘北之决占昔,唯夏杨两军长是问”。^② 两军在龙门厂周围地区对日军奋力阻击,双方战斗十分惨烈,伤亡均大。日军为达成战略目的,不避牺牲,一意南下。又南侵长寿街、嘉义等地。至30日,第33师团与自平江前来接应的湘北日军奈良支队会合于三眼桥,攻势达到顶点。但因连日苦战,一再受阻,兵力损失严重,加上中国军队采取了灵活的外线作战方式,在湘北将其围歼已不可能。

平江附近的日军第33师团和奈良支队在10月2日开始撤退,分路逐次退往鄂南通城。10月10日,中国第133师抵达麦市,与通城之敌对峙。鄂南方面的战斗结束。

从9月14日至10月15日,中国第9战区部队与日军第11

① 《蒋介石致王陵基密电》(1939年10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一次长沙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军在湘鄂赣的3个战场上激战一个月。这次会战中,中国方面动用了24个步兵师、3个挺进纵队,24万人;第11军出动4个师团、2个炮兵联队、2个步兵联队、1个工兵联队,加上海空军,共约10万余人。战斗的结果是,中方伤亡失踪者有40293人;日方伤亡约在3万以上,各种损失均惨重。双方完全恢复了原有的对峙战线。整个会战,由日军主力进攻开始,由日军自动撤退结束,战场主动权基本上操在日方。仅就局部而言,可说是未分胜败。然而从进入相持阶段的抗战全局而言,却明显对中方有利。日军周密策划,出动重兵,以求达成消灭第9战区野战主力的目的,结果并未成功,反而损兵折将,消耗不少,最后以撤回告终。虽然日军根本就未把攻占长沙作为战略目标,但对如此重要的城市不能攻克,是全面抗战以来少有的。中方将此视为敌人战斗力下降、士气不振,而备受鼓舞。冈村宁次战后总结时说:“由此看来,今后进攻作战,一旦攻陷要地,即须予以确保。”^①相反,中国军队的战前准备较充分,战术运用较合理,将士用命,民众配合,敌军计划落空,获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尤其是长沙得以保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

会战结束之时,正值“双十国庆”,全国许多地方举行了祝捷大会,“以川省之重庆,湘省之衡州,滇省之昆明,粤省之韶关,浙省之宁波,河北之恩施,广西之桂林,以及皖南、苏北各界,……无不举行湘北胜利庆祝大会。参加民众多者数万,少者数千,或飞电祝捷,或宣言讨汪,或举行提灯,或集合演戏”。^②蒋介石认为:“第一次长沙大捷,日军伤亡超过4万人,乃在国军大获胜利的情况下结束,这项捷报为民国二十八年双十节带来了光辉。”蒋介石在日记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长沙作战》,中华书局1985年9月,第5页。

^② 《长沙会战纪实》,第358页。

中写道：“际此双十国庆，适值湘赣告捷，宜乎欢欣鼓舞，无愈于此。”^①他下令给第9战区犒赏15万元，湖南省政府出资两万，奖慰官兵。第9战区短时期内共收到各方捐款34万余元。^②各地还派出劳军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官兵。

五、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国内战场上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和国际上欧洲战争的爆发，对中国的战局有重大影响，甚至在战略上有转折意义。所以，第一次长沙会战刚一结束，就决定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以“扩大胜利成效”，“检讨得失，策定后期抗战应取之战略”。^③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于1939年10月下旬举行，蒋介石把会议名称定为“江南战场各战区党政军联席会议”，出席者有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及少数特种师师长、各省主席等高级军政官员两百余人，会上主要研讨了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布置今后的作战方针。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代表蒋介石主持会议。会议结束前，蒋介石特意从重庆赶到南岳会场，对高级军政干部训话，以之作为总结。

蒋介石首先分析国际形势的演化，指出中国的国际外交环境，“一天一天好转”。他说，由于欧洲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时间上已与欧战连接起来，抗日战争只有坚持到世界范围内，“公理正气伸张之日”，“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④他列举欧洲开战以

① 陈寿恒等：《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第353页。

② 《长沙会战纪实》，第374页。

③ 邓文仪：《记南岳三会与长沙三捷》，台湾《艺文志》，第259期，第21页。

④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载《作战经过（二）》，第195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来美国、苏联等国对日本态度趋向强硬的事实,说明美苏英法诸国“必能坚定其一贯的立场,共谋压制侵略暴力。因此,乐观地估计,“此后3个月中,国际外交必更利于我之大进步,足以帮助中国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固然对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外国援助抱有极大的幻想,但以往多次碰壁的教训使他不得不告诫部下: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切要求助于本身”,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要靠“自力图强”。^①

接着,蒋介石又分析了长沙会战胜利所带来的变化。他说,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预示着中国抗战局势“已临到胜利的一个大转机”。在国际上湘北大捷使外国人对中国战场的观感焕然一新,对中国军队也开始“另眼相看”,他们对中国抗战前途的疑虑担心消除了。在国内,敌我双方的气势与心理开始逆转,中国一般国民“格外坚定,与上月底的情形,可以说是完全两样”。相反,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以及其国内一般民众厌战心理已经暴露出来”。因而,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抗战进程,“无论哪一方面看,都已达到了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②

训话的最后,蒋介石说明了未来的抗战战略和政略。在战略方面,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要在见到敌人厌战畏战之时,决然攻击前进。蒋介石认为,依目前的敌我力量对比,中方尚无力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战。但要设法研究出一套避实就虚、乘间蹈隙的方法,攻击骚扰各地日军;在政略方面,蒋介石强调,中国的抗战是整个世界问题的一环,一经发动,就“一定要与势在必起的战争连接起来,并且要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欧战爆发,中国第

①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载《作战经过(二)》,第192页。

②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载《作战经过(二)》,第190页。

步的政略目标,即与世界战场连接已经做到,第二步的政略目标是要争取和世界战争同时获胜。因此,要坚持抗战到底,绝不能幻想中途与日本妥协议和。他要求各级将领本着抗战到底的信念,“在各前线坚守奋斗,愈战愈劲,不问国际形势如何变迁,不管抗日环境如何困难,只是埋头努力一意作战,用最大的韧力,和敌人拼下去”。^①

湘北大捷是一段时间以来正面战场上少有的重大胜利,参战部队的各级将领有不少人想借机升官。据参加会议的邓文仪回忆,当时不少人盼着蒋介石论功行赏,当师长的想升军长,军长想当集团军总司令,“会议过程中,充满了这种人事升调的议论与空气,也有不少的(战区)司令长官向蒋委员长申请保举”。蒋介石感到困扰和气恼,特地就人事升迁保举问题进行批评。他说,中国高级将领的实际才能都很有限,以他自己论,自问只能胜任一个军长,如今却当了全国统帅,“实在感到惶恐”,深觉力不胜任。而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学识才能,最多只能胜任一个师长,当集团军总司令的人,最多只能胜任一个团长,当军师长者的才识只配充任营连长。现在大家都已做了高于自己才识三级的将军还嫌不够,还要逾格升迁,实在说不过去。蒋介石责问,清朝末年尚有左宗棠、徐树铮等能拱卫西北、蒙古的封疆大臣,在座诸位有谁可以担当左、徐那样的事业。因此,“于此际国家危急存亡之秋,对外长期作战的时令,不宜以个人名位为念,而应作战,建功立业”。蒋介石一阵训斥,怀有邀功请赏之心者如冷水灌顶,场内一片寂静,“全场的人,都感到有些惭愧的神色”。为安抚人心,蒋介石又说,每个人只要切己省察,努力充实自己,日后不愁没有大任担当。^②

① 《蒋介石对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载《作战经过(一)》,第195页。

② 邓文仪:《记南岳三会与长沙三捷》,台湾《艺文志》,第259期,第21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利用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来鼓舞士气,并判断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抗战的内外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试图策定“反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新战略方针,以因应新局面。在此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不久即发动了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局部军事反攻行动——冬季攻势。但会上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胜则居功邀赏,败则诿过推卸的不正常心理。同时,会议对长沙会战中的具体战术部署及运用研究得很不够,以致两年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日军采用大致相同的方法进攻长沙,中国军队却吃了败仗。

第四节 桂南会战

一、日军偷袭钦州湾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被迫转入对华长期战争,而全面封锁中国,切断中国与海外联系遂成为日军大本营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中国与国际间的联络主要依靠两大孔道,一是西北国际交通线,由新疆通往苏联,纯属陆上交通,因日军鞭长莫及,这条路线相当安全,苏联援华军用物资由此源源输往中国,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这条交通线的不足之处在于费用昂贵,运输量受到限制。另一个则是海上交通线,也是中国最重要和最便利的对外贸易渠道。但全面抗战开始后,天津、上海、青岛、广州等港口城市相继失守,中国最重要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1939年2月,日军占领了海南岛,6月占领了汕头、潮州,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封锁。在此种情形下,西南国际交通线便日见重要了,它主要分为3条路线,其一为滇越铁路,由越南河内抵达云南昆明;

其二为桂越公路,自汕头弃守后,桂南的北海等地已成为中国唯一直接的出海口;其三则为滇缅交通线路,但运输条件远逊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日本军方作出如下判断,即“中国虽已丧失华南沿海主要港口,但仍能自法属安南及缅甸方面获得补给,而广西公路成为中国之主要补给线,其输入量,每月约达4千至6千吨,占输入额的百分之三十”。^①因此,日军大本营急于切断广西与海外联系的孔道,于1939年秋决定进攻南宁。日方在桂南开辟新的战场还有两个重要企图,一是向国内外炫耀武力,掩饰其在中国战场上泥足深陷的窘境,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其二是为南进建立基地,向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伺机侵入越南。

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375号”作战命令,陆海军达成作战协定。协定规定,攻占南宁的作战目的在于直接切断中国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联系补给路线,作战时间预定为11月下旬。^②日军作战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控制钦州湾,进行登陆作战。

桂南地区山川纵横,地势险峻,位于邕江与桂越公路交汇处的南宁是敌我方双势所必争的战略重镇。桂南属第4战区,应归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但因广西是势力强大的桂系集团的故乡,因而广西境内的一切军事部署都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直接处置。他是桂南会战的中方最高指挥官。部署在桂南的夏威等第16集团军为广西军队,直接听从桂林行营的调遣,担负着维护中越国际交通线的任务,负责桂南及粤南部分沿海地区的海防。

第16集团军为预防日军登陆,对日军登陆作战作了估计,判

① 《抗日御侮》第7卷,第9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41-42页。

第三編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断有3种可能:一是日军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等处登陆,然后向宾阳推进,威胁南宁;二是日军主力由北海登陆,攻取灵山、横县后溯江而上,直逼南宁;三是日军一部在北海登陆佯攻,主力则由钦县、防城登陆,沿邕钦公路(南宁—钦县)向南宁进攻。当时判定钦县、防城地形不佳,北海登陆也受公路破坏和防御工事的影响,因而日军最可能采取第一种方案,桂林行营据此制订了桂南会战指导方案。^①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军事委员会认为日军苦于兵力短绌,在桂南实施登陆作战的可能性甚微,因而集中精力筹划年底将要发动的冬季攻势,减少了桂南驻军,原驻桂南的第31军3个师奉命调往广东西江,桂南驻军只剩下第46军及两个独立团,加上一些地方团队,计约两万余人,且分散配置于南宁、贵县以南至北海沿岸既设阵地,防守着漫长的海岸线,首尾无法相顾。第46军的第170师奉调为第16集团军的总预备队,第175师任北海、电白方面防务,钦州、防城一线只剩下新19师,师长黄固指挥所部4个团防守200公里以上的海岸线,深感兵力单薄。

日军以今村均第5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为登陆作战主力,海军第5舰队及海军第1、第2航空队协同作战,由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统一指挥,准备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登陆。11月中旬,第5师团及台湾旅团先后抵达海南岛三亚湾集中,13日,由三亚湾出发。15日黎明,日军舰艇和运输舰船云集钦州湾,以舰炮猛烈轰击海岸,并在企沙和龙门两处登陆。

新19师官兵对登陆日军进行了有力的阻击,黄固师长下令部队“务于敌登陆立脚未稳之际,努力将敌歼灭于海滨”。^② 日军步

①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1939年冬季攻势

兵一波又一波地登陆冲锋。傍晚,守军迫于日军火力甚猛,放弃滩头阵地,退守防城附近后备工事。16日,由企沙登陆日军向防城进军。另一部在钦县附近的犁头嘴登陆,乘大雨涨潮之际,以汽艇沿渔洪江直趋黄屋屯。面对严峻的形势,第46军军长何宣命令新19师“竭力固守平旺、钦县附近第二线阵地,无令不得退”。^①17日,犁头嘴登陆日军凭借飞机掩护,猛攻钦县,一部从中国军队侧背攻入城内,巷战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新19师撤出钦县。

日军巩固滩头阵地后,以南宁为目标,形成3路钳击攻势。左路及川第9旅团由防城出发,19日在在贵台墟附近突破守军阵地,进抵唐报,从西南方威胁南宁。中路日军一联队在占领黄屋屯后长趋直入,于18日抵达大寺,直逼大塘。右路中村第21旅团由钦县沿邕钦公路向小董进攻,18日占领小董。新19师连日苦战,且势单力薄,不得已退守上思、板城。至此,日军已从东南、西南、南三面包围了南宁。南宁城防空虚,第16集团军其它部队都距离日军100公里以外,最远的达300公里。

二、南宁失守

为遏制日军攻势,保住南宁这一西南边陲重镇,军事委员会令第16集团军以两个师“固守南宁,无令不得撤退”,并紧急调遣杜聿明第5军由湖南衡山增援桂南,傅仲芳第99军由湖南湘潭及贵阳移至柳州,姚纯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赴宜山集结。限各军均须在12月15日前输送集中完毕。但省外援军路途遥远,就是第16集团军各部也因过度分散,集中不易,调往西江的第31军匆匆回援。敌我双方急向兵力空虚的南宁前进。

日军进展甚速,抢先于19日进抵唐报、百济一线。第21军令

^①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台湾旅团留守钦州,掩护第5师团的补给线,第5师团则穿十万大山,于21日向南宁周边的平地进击。第46军第170师在良庆、蒲庙等地顽强抗击。良庆陷落后,日军于22日黄昏抵达邕江,直取南宁。

守军在邕江北岸与日军夹江对峙。22日下午,第31军第135师师长苏祖馨被委派为邕江北岸守备司令,第170师师长黎行恕为守备司令。但这两个师的主力尚未到达南宁时,各路日军已分别开始从剪刀圩、上下洲、良庆圩等处渡江。23日,第135师等部与渡江日军剧战20余次,但因系兼程而至,仓猝上阵,未能有效阻敌于邕江南岸。24日,渡江日军已达数千人,在空中掩护下,主力分由东西向南宁夹击,与守军激战于市郊。上午9时,由良庆圩渡江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第21联队率先突入市内,第135师因腹背受敌,被迫放弃南宁。南宁周围的第46军、第31和第5军第200师分别退守南宁西北及北面的高峰隘、昆仑关等地。

高峰隘及昆仑关一带地势险要,为南宁北侧之天然屏障。日军为确保对南宁的控制,决意占据这两处天险,为此兵分两路。一路以中村支队及骑兵联队为主力,沿邕宾公路(南宁—宾阳)北进;一路以第41联队由邕武公路(南宁—武鸣)北上。25日,邕武路上的日军推进至二塘,遭到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的奋勇抗击,守军伤亡达1/3以上,团长邵一之阵亡,该团仍死守不退,阻住了日军去路。其后日军攻占了四塘,截断了该团的后方补给线,该团为避免被包围,遂利用夜幕为掩护,与第170师等向高峰隘地区撤退。30日,日军经过一番激战,占领了八塘,中国军队退往九塘。12月1日,日军及川支队进占南宁西北的高峰隘,该方面的中国守军向武鸣方向退却。12月2日晨,韦云淞第31军第188师在4辆坦克及火炮的协同下反攻八塘,日军一度被迫退却,由于道路、桥梁损坏严重,中方坦克难以通行,与日军形成对峙。3日,中村

支队主力由南宁来援,4 日占领了昆仑关。6 日晨,中村支队主力仍回南宁,留下 1 个大队日军驻守昆仑关,同时以一部兵力驻守邕宾公路沿线的九塘、八塘、四塘等重要据点。中日双方在高峰隘、昆仑关一线处于相持状态。

三、昆仑关大捷

自日军登陆钦州湾,半个月间,桂南守军一路败退,未能有力遏止日军的快速推进。当中方指挥官白崇禧得悉进犯广西日军仅有一个师团,且缺乏坦克和重型武器装备,遂拟定反攻南宁计划,得到了军事委员会首肯。重庆方面十分重视桂南的战事,认为日军人桂“目的不在广西,而在切断滇缅、滇越及滇黔之交通,已属显然”,^①担心日军进攻柳州,威胁贵阳、重庆等心脏地带。为稳定大后方,确保国际交通的畅通,蒋介石于 27 日决定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反攻行动,参加反攻的军队为夏威第 16 集团军(辖第 31 军、第 46 军)6 个师、叶肇第 37 集团军(辖第 66 军)2 个师、邓龙光第 35 集团军(辖第 64 军)2 个师、徐庭瑤第 38 集团军(辖第 2 军、第 5 军、第 6 军、第 99 军和第 36 军)13 个师,另有桂林行营直辖的第 43 师(师长金德泽)、新编第 33 师(师长张世希),另外还有 4 个独立团,合计有 26 个师,19 万人左右。配合步兵作战的有野战重炮兵 3 个营另两个连,空军第 2 路部队以 100 多架战机协助地面部队行动。

11 月 26 日,白崇禧前往江水河北岸的迁江坐镇指挥,12 月 16 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军以攻击北犯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一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 879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① 依照作战部署,第一个阶段是攻占高峰隘、昆仑关,第二个阶段为攻占南宁。反攻部队编成东、西、北3路军。由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任东路军指挥官,率第46军、第66军担负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敌后交通的破坏和袭扰任务;由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任西路指挥官,率部攻击高峰隘吸引日军主力,以部分兵力进至邕宾公路上的四塘,破坏敌后交通,阻止南宁日军增援,孤立昆仑关日军;由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瑤任北路军指挥官,指挥第5军、第99军第92师作为主攻部队,攻击昆仑关,其后与东、西路军协同攻取南宁。

攻击昆仑关的第5军由军长杜聿明指挥,该军辖郑洞国荣誉第1师、邱清泉新22师、戴安澜第200师、军补充第1、第23团,并配备有装甲兵团、炮兵队、高射炮队等,它是中国军队中惟一的机械化部队,它的人员和装备不亚于日军一个师团。杜聿明以第22师为右翼部队,袭击五塘、六塘,断敌退路;以荣誉第1师为左翼部队,协同第200师一部和军补充第1、第2团围攻昆仑关及八塘正面日军;由第200师主力骑兵团充任总预备队。第99军进攻昆仑关以南日军,协助第5军作战,并在五塘一带阻止日军增援。

18日晨,荣誉第1师在战车和炮兵的掩护下,对昆仑关发起正面攻势。据守昆仑关的日军松本大队在中国军队猛烈打击下,纷纷向核心阵地收缩。中午,反攻部队攻占了罗塘、同兴西北高地,随后占领了石寨隘、同平、桔桃岭,一部推进至九塘附近,进展颇为顺利。

日本第5师团长今村均不相信中国能集结数十万大军反攻,

^① 《白崇禧致蒋介石何应钦电》(1939年12月1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 月 17 日尚命令及川支队攻占位于中越边境的要地——龙州，及至中方开始反攻，今村均慌忙于 20 日下令及川支队放弃龙城，回师协同防守南宁，但该部队沿途受到袭击，至 29 日始返回南宁。为增援昆仑关方面，今村均急令第 21 联队长三木率联队主力增援昆仑关，该联队于 18 日晚分乘 31 辆汽车沿邕宾路急进，但遭到第 99 军的拦截，只有一个大队突至昆仑关。

19 日上午，荣誉第 1 师左翼部队向 653 高地进袭。653 高地为昆仑关东北之要点，可以瞰制整个昆仑关战场。因攻击屡遭挫折，我方官兵携手榴弹冲入敌阵，与日军短兵相接，终于掌握了这一制高点。

为协助昆仑关方面作战，新 22 师在五塘阻击增援昆仑关日军，西路军在高峰隘方面发起攻势，东路军则在小董、钦县、大塘、蒲庙等日军后方重要地区频频出击，昆仑关方面的日军后方联络线被切断，各分散据点及沿邕宾路增援昆仑关的日军后续部队遭到分割包围，整个第 21 联队已陷于极度孤立，但日军冒死固守，相当顽强。

自 20 日起，第 200 师接替消耗甚大的荣誉第 1 师担负主攻任务，包围圈逐渐收缩，但战至 22 日，攻击尚未得手。23 日，杜聿明决定“以重点指向罗塘高地附近，继续对当面之敌攻击”。^① 罗塘为昆仑关西侧高地，也是日军的一个主要支撑点。24 日，荣誉第 1 师以第 2 团及迫击炮营担任主攻，以排为单位，梯形配备，向罗塘高地两侧攻击，用大刀等简陋器械连破日军两道铁丝网防线，冲入日军阵地。当时日军已完全靠空投物资生存，快要弹尽粮绝，“已将附近四周残留食物吃光，只能检拾地里的落穗充饥”。^② 第 21

①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 510 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联队长三木一面准备烧毁军旗,一面向中村正雄旅团长发电求援,哀叹“傍晚前旅团若来不到,第一线难以确保”。^① 可日军援军已无从增援罗塘高地。24日晚,荣誉第1师克复罗塘,守备该地的日军第5中队几乎一卒未剩,全被歼灭。而担负主攻的第2团突击营也仅剩下数十人。

昆仑关方面吃紧时,中村旅团主力于20日从南宁出发,前往救援,沿途遭到多次阻击,24日下午才进抵九塘,在荣誉第1师的攻击下,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此时,第5师团第21旅团主力均已投入昆仑关及邕宾路方面,陷入中国10余师的围困之中,有全军覆没的可能。

24日,第200师沿公路两侧,向界首附近高地攻击。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东侧,峭壁悬崖高耸,与罗塘高地成犄角之势,可东西俯瞰昆仑关。25日下午,中国3架轻型轰炸机,一架驱逐机,飞抵昆仑关上空,日军误认为是己方战机,铺置信号板示意,中国飞行员乘势俯冲扫射,投弹18枚,全部命中目标,日军遭到重大伤亡。29日,经过重炮轰击、白刃肉搏,第200师终于重新占领了界首附近各据点,顶住了日军的疯狂反扑。

29日夜,新22师超越第200阵地,接替正面主攻任务。30日,新22师先后攻占了南北同兴、界首村落及其东南各高地,为收复昆仑关创造了条件,这一天日军遗体百余具,新22师官兵伤亡也达300余名。^② 31日拂晓,新22师在友军第159师、荣誉第1师的协同下,攻入昆仑关,全部克复昆仑关东西两侧高地,日军向九塘溃退。

①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58页。

② 《陆军新编22师五塘、六塘、昆仑关、九塘诸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0 年 1 月 1 日,增援昆仑关的日军台湾旅团与及川支队等已抵达九塘,与昆仑关溃退下来的日军汇合,构筑工事,企图稳定战线,伺机再占昆仑关。第 5 军决定乘胜追击,向九塘及 441 高地进攻。441 高地是控制九塘至昆仑关公路的战略要点。3 日,荣誉第 1 师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攻占了 441 高地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入夜,日军渐形不支,便残忍地施放毒气助战,荣誉第 1 师的将士们不顾生死,鼓勇而进,441 高地终于被完全收复,昆仑关阵地更形巩固。4 日上午,新 22 师攻占九塘,从 5 日起,又与第 200 师尾追日军至八塘。八塘日军以逸待劳,负隅顽抗,第 5 军的进攻势头至此陷于停顿,与日军胶着于八塘一带。11 日傍晚,第 5 军奉命将防务交由第 36 军接管,集结思陇附近整理待命。

反攻昆仑关战斗赢得了最后胜利,第 5 师团在日军中素称精锐,转战山西、鲁南、豫北、广东诸战场,这次在桂南受到严重失败,中村旅团大部被消灭。第 5 师团总计伤亡 1/3 以上,“第 5 军每个士兵几均得有战利品”,^① 昆仑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罕见的一场成功的正面攻坚战。这固然是由于第 5 军将士勇于牺牲,然而,至关重要的是第 5 军在攻击时,不仅人数占绝对优势,而且获得了战车、炮兵乃至空军的有力配合,在桂南战场上,日军除空军稍占优势外,在重炮、战车等方面比起中国军队反而相形见绌。不过,日军训练有素,官兵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斗志相当顽强,执行命令彻底,各部队在作战时密切配合,如 12 月 17 日间,担负掩护钦县、防城至南宁间后方联络线的台湾混成旅团得知第 5 师团在中国军队全面压迫下处境危险,便不顾指挥系统的不同,自动将两个联队派往南宁,交由第 5 师团支配使用。中国军队在昆仑关

^① 《苏联顾问加路诺夫关于桂南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主攻方面属于攻坚战斗,而日军处处死守不退,致使中方每次进攻都得付出很大牺牲。当时的中国军队一般只有持续3~4天的攻击能力,而第5军已在昆仑关连续攻击两周时间,在反攻中便有11000人负伤,5500人为国捐躯,^①因此,这支精锐之师在攻下昆仑关后已是疲惫不堪,未能乘势扩大战果,整个反攻陷于消极停顿,占领南宁这一反攻最主要的目的并未达成。

四、宾阳之战

日军轻易占领南宁后,从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直至第5师团指挥官,均轻视中方反攻南宁的决心和实力,及至昆仑关受挫,日方才痛感危机严重,担忧第5师团会全军覆没。1939年12月底,第21军决定增派近卫混成旅团和第18师团至桂南地区,伺机击溃中国军队主力,确保南宁的安全无虞。1月22日,近卫旅团在钦州集结,第18师团则运抵南宁以南地区。

中方也继续调兵遣将,军事委员会从湖南、广东、四川等地调集大量生力军驰援桂南,任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具体部署桂南决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陈诚不居名义,协助白崇禧、张发奎指挥作战。张发奎开始并未参与指挥桂南会战,1月27日始匆忙率幕僚前往迁江指挥,所行之事不过签名画押而已。

从1940年1月5日至26日间,桂南战场显得异样沉静,交战双方均在暗中进行决战准备工作,先完成战略展开的一方将赢得战争的主动权。日军机动力强,行动隐蔽快捷,至26日已完成增援部署。而中国军队尚在紧张调度中,“桂南用兵三十万,仅桂邕公路为其主要交通线”,迁江与宾阳之间横亘有红水河与清水河,河幅约20米左右,共计只有一座公路浮桥,一处公路轮渡及一座

^① 《桂南会战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徒步单行的军用桥而已,^①况且白天要避开日军飞机的袭击,夜间始能运动,致使输送工作迟滞缓慢,尽了最大努力始于 2 月 2 日输送完毕,而这一天宾阳已被日军攻陷,大势已去了。

1 月 25 日起,日军第 18 师团在邕宾路上发起攻势,袭击了第 6、第 99 军在七塘等处的阵地,企图突破昆仑关右翼阵地,从右侧背迂回昆仑关方面中国军队主阵地。但第 99 军、第 2 军等坚守不退,日军在正面无法取得进展。27 日,近卫旅团等在中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至永淳,28 日,由永淳渡过邕江,中国军队发觉过迟,无从阻止,第 18 师团一部和近卫旅团分别进入甘棠东西一线,准备迂回昆仑关主阵地的侧背,桂南战局的重心从昆仑关移到甘棠、古辣一带。桂林行营计划在甘棠、古辣一带阻止日军,令第 64 军、第 46 军、第 2 军、第 66 军向甘棠方向四面合围,惜各军行动迟缓,动作未能协同,第 2 军李延年部仓促赶到指定地区,因不明情况,逐次投入兵力,消耗很大。第 46 军冒着日机的轰炸,艰难向目的地前进,但因抵达稍晚,已无补战局。至于第 66 军则始终彷徨游移,未到达指定地点。该军军长叶肇因迭次临危不前,对战局影响甚大,战后受到撤职交军法审判的严厉处分。

2 月 1 日,日军抢先对甘棠发动陆、空联合攻势,日机对宾阳狂轰滥炸,炸中了第 38 集团军总司令部。第 38 集团军辖有桂南战场上中国军队的主力,即第 2 军李延年部、第 5 军杜聿明部、第 6 军甘丽初部、第 99 军傅仲芳部、第 36 军姚纯部,集团军司令部为前线各军通讯联络中心,遭到破坏后,各部队之间,各部队与司令部之间的电讯联系中断,陷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无从组织有效抵抗。2 日凌晨,日军占领甘棠,经古辣一带平原长趋防务空虚的宾

^① 《第 101 军桂南昆仑关之役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阳,于2日下午加以占领。3日,第18师团进入邹墟,控制了邹墟北面的清水河桥梁,截断了昆仑关一线中方大军的后方联络线。

宾阳一失,中方在战略上全盘陷于被动,在昆仑关主阵地的第2、第6、第36、第99、第102军等均因后路被断而处境困难。3日至4日,第46军复克甘棠及永淳。蒋介石认为深入冒进的攻占宾阳的日军后路已绝,正是加以歼灭的良机,4日下令:“在迁江附近之主力,应即向当面之敌猛攻,占领宾阳,与我昆仑关各军夹击在昆仑关附近之敌面歼灭之。”^① 日军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坐镇南宁指挥,4日已决定结束战役,但为了便于撤退,日军仍摆出向北突进的架势。中国前线部队虽后路被断,但数量远超过冒险而进的日军,不过,由于指挥陷于混乱,前线部队脱离掌握,无从正常调度,素来缺乏独立作战能力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未能把握时机以优势兵力反击冒险深入的日军迂回部队,且因后路被断,自行慌乱,战意顿失,各部忙于自身突围,演变成大溃退的局面。第2军副军长兼第9师师长郑作民欲率部坚守昆仑关阵地,扭转崩溃局面,不幸战死。昆仑关等要地再度易手。上林、武鸣等也相继弃守,情势至为紧急,幸亏大批第2线兵团赶至,战事才转危为安。沿邕宾路北犯日军被新33师挡在清水河南岸。5日起,第64军由贵县向宾阳日军侧击,在宾阳至贵县公路上的中国军队从正面发起攻击,经三昼夜激战,终于将日军击溃。

桂南日军冒险深入,战线愈拉愈长,宾阳至海岸交通线延长至200多公里,补给困难。从2月9日起,日军开始大举南撤,先后放弃了上林、武鸣、宾阳诸要地。16日,第18师陆续由钦县及龙门港乘船回粤。桂南日军收缩战线,只谋求巩固对南宁一带切实

^① 《蒋介石致白崇禧、陈诚、张发奎电》(1940年1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1939年冬季攻势

占领。中国军队尾随南下,先后进抵昆仑关、高峰隘东西阵地。2月14日止,“五塘以上六、七、八、九塘迄昆仑关一带,完全被我克复”。^① 日军据守五塘、高峰隘一线以护卫南宁。

宾阳之战,中国在桂南一隅集结了30余师精锐部队从事会战,这在武汉会战以后尚属首次,证明军委员会有反攻南宁驱逐日军出桂南的战意。至于日军,经增援后计有3个师团兵力,占有空中优势,运用其擅长的迂回包抄战略,利用第38集团军部署上的疏忽,抢占甘棠、宾阳,打乱了中方整个战略部署,加上中方指挥中枢被炸,指挥系统陷于瘫痪,昆仑关方面守军主力不幸演成溃败之局面。但因中国军队兵力相当雄厚,兵力单薄的日军终究无力达成歼灭中国野战军主力的目的,能够击溃中国军队主力,已是日方满意的结果了。据日方统计,宾阳之战中,中国军队阵亡27000人,被俘1167名,日方仅死伤2300名。^② 宾阳战役的失败对1939年底开始冬季攻势无疑是最大挫折。

五、日军退出桂南

日军大本营于1940年2月9日撤销第21军,成立了华南方面军,脱离中国派遣军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司令部设广州。桂南地区成立第22军,由第5师团、近卫师团及台湾旅团编成,控制着南宁、钦县、防城及连接它们的交通要道。

日军占领南宁及其以南地区是战术上的成功,在国内国际间一时有轰动性的宣传价值,但从整个中日战争局势的发展来看,其战略价值已成疑问,桂越交通虽被切断,中国通过滇缅路仍可以从国外获得补给。桂南日军孤军深入中国内地,要长期维持占领相

① 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第344页,文星书店印行,1962年版。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519页。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当困难,而且维持占领军补给的代价十分昂贵,对整个中日战事并无太大影响。不过,日军占领南宁、龙州不仅是针对中国,而是包藏有更大野心,它是日军准备进驻法属越南的前奏,为南进英、美、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设立一个基地。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日军占领桂南对中日战争的影响愈发无足轻重,其战略价值已完全集中在南进上。1940年春,法国被纳粹德国击败,日本当局乘机决定控制越南,控制越南自然即可切断桂越、滇越之间的交通。为节省兵力,集中力量南进,准备放弃桂南,1940年9月起,驻扎桂南的第5师团主力进入越南北部地区。

日军的退却计划因中国军队的不断袭扰而加速进行。1940年3月,第64军和第16集团军发动春季攻势,邕钦路以东部队为第64军和第46军编成东路兵团,由吴奇伟指挥。3月12日,第46军切断了邕钦路,同时,邕江北岸的中国军队向南宁外廓的日军防卫阵地发起攻击。14日,台湾旅团一个联队由钦州北上,强行打通邕钦路,以确保南宁解除侧背威胁。16日,日军占领陆屋、归州,经与第64军激战后,17日占领了灵山,但日军兵力不敷防守,旋即撤退,22日中国军队复入灵山。

6月17日,邕江南岸日军沿南宁至龙州路向西进犯,26日攻陷明江,7月12日占领了龙州。从3月12日至10月12日,中国军队在桂南与日军作战百余次,予日军重大消耗。

日军自9月下旬开始从桂南撤军,并严密封锁消息,使得中方“不能适时获得情报,致未及捕捉敌人主力,予以重大打击”。^①至10月中旬,中方侦悉日军全面撤退的情报,全线转入反攻。

10月13日,第31军第188师开始围攻龙州,第46军则在龙

^① 《第46军周祖晃部在钦县防城追击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江以北策应,阻止日军增援。第 188 师于拂晓一度由西门突入城内,日军进行逆袭,攻城部队伤亡甚重,转移至城外。26 日以后,龙州、凭祥日军约 2 000 人陆续撤入越南境内,第 31 军于 28 日收复龙州。

龙州克复后,第 16 集团军奉命肃清邕龙路东段的日军,第 3 集团军主力则分由邕宾、邕武路尾追日军,直逼南宁。一部在邕江北岸发动攻势。29 日占领了高峰隘、三塘、剪刀墟等地,30 日克复南宁。日军沿邕钦路这一惟一生命线向钦县南撤。中国军队紧追不舍,致使日军撤退时往往非常狼狈,许多破坏计划均未及实施。为掩护猥集于钦县的日军主力两万余人登舰撤走,日军一部在以黄屋屯为中心的一线阵地上阻挡中国军队的追击,11 月 11 日,日军主力已经离开桂南,14 日下午,最后一批日军全部匆匆在龙门港登舰撤离。

经过整整一年的战斗,桂南会战遂告结束,侵入桂南的日军被全部驱逐出境,广西全省重新成为中国抗战的后方基地。

第五节 1939 年冬季攻势

一、冬季攻势的背景及计划的制定

抗日战争进入 1939 年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全局性的战略进攻,转而致力于保守和巩固已占领的地域,企图消灭占领区内数目庞大、系统复杂的中国敌后游击部队。对于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采取攻势防御,只进行局部性的进攻,这种攻势主要包含两种意图:一是占领某些战略要点,改善日军占领区所处的战略态势,攻略南昌的主要意图就在于此。二是寻找机会打击、消耗中国野战军主力,挫折中国军队的士气,这在随枣会战和第一次长沙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会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在第二种情形下,日军每次攻势的持续时间均甚为短暂,一般在两周左右,而且攻势结束后都几乎退至原有防线。在广大的中国战场上,日军将其庞大的侵略军分散配置于占领区的各处要点,能机动使用的兵力则越来越少,每组织一次大规模攻击行动均须从各处调兵,东拼西凑才能进行,日军兵力短绌的痼疾已是无法遮掩的事实。

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即已表示,中国已进入第二期抗战,已到了转守为攻的时期。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在国际上四面楚歌,对华战争已是进退维谷,“似在长江珠江两岸均改取守势,抽调兵力,注重华北方面,实行所谓扫荡我游击队之计划,妄图巩固占领区域”,^①因而,中国军队于1939年2月决定发动春季攻势,破坏日军战略意图。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先后指示各战区抽调部分兵力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其中除春季攻势尚具规模外,夏、秋季攻势均未投入有生力量,效果甚微。不过,值得肯定的是,这种有限度的主动出击的战略指导仍是武汉弃守前所未曾有过的。1939年秋,发生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未受重创便匆匆返回原来防线,这使蒋介石及其左右都相信日本国力穷困,日军的力量已臻极限,日本国内人民及在华士兵都开始产生厌战情绪,因而产生了一种轻敌乐观心理,认为日军已丧失继续进行战争和大规模攻势的余力。且欧战已经爆发,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和法西斯阵营之间的壁垒已日渐分明。中国的抗战已与欧洲战争连接起来,国际形势的演变对中国有利,因此,中国应乘此绝好时机组织大规模的反攻,“企图夺回重要据点,树立最后胜利之根基”。^②恰逢此时,中国的第二期军队整训工作已届完成,部队实力大为恢复

① 《作战经过(一)》,第183页。

② 《林蔚次长冬季攻势讲词》,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和增强,1939 年 10 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遂决定发动冬季攻势,预备将第二期整训部队主力加入攻势,反攻规模将远远超过春季攻势等历次反攻。

1939 年 10 月 10 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订了《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① 根据这一计划,军事委员会准备将全部兵力的 46%,约 80 多个师投入反攻。规定第 2、第 3、第 5 战区为主攻方面,第 2 战区的使命是肃清同蒲线南段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 3 战区攻击荻港、贵池等沿江日军,切断长江交通。长江为湘鄂赣华中日军的主要补给线,切断它,整个华中地区的日军便陷于孤立,难以立足;第 5 战区则负责扫荡平汉线南段武汉、信阳间的日军;第 1、第 4、第 8、第 9 及苏鲁、冀察等战区则担任助攻,牵制各地日军,使主攻方面作战容易,同时全面破坏各地交通动脉。该计划确定的作战重点是晋南和华中地区,尤其是华中地区为攻势的重心,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时即已决定:“今后华中作战计划,不特应阻止敌军继续西进,并须压迫敌人向东撤退”。^② 如有可能的话,就努力占领武汉、信阳、九江等要地。计划策定者显然是乐观和雄心勃勃的,意欲一举扭转中日战局的形势,使其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国。蒋介石也对冬季攻势寄予莫大希望,亲自确定了各战区应努力夺取的战略要地和重要城市,其中有武昌、汉口、信阳、开封、包头、南宁等,并规定了完成任务应得的赏金,如占领汉口或武昌便奖赏 100 万元。11 月 18 日,蒋介石正式向各部队下达了冬季攻势命令,预定助攻战区于 11 月底开始攻势,主攻战区则于 12 月上旬开

① 《国军冬季攻势作战计划》(1939 年 10 月 10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林蔚次长冬季攻势讲词》(1940 年 4 月 1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始行动。12月12日,冬季攻势全面展开时,蒋介石电示各战区将士,强调了冬季攻势的意义:“此次冬季攻势为我抗战转败为胜之唯一关键,亦即我第二期抗战最后胜利之开始”,“我军歼敌唯一之良机,至今确已到来”,“此次进攻不惟足以粉碎敌军冒险侵略之野心,且足以促成敌国内对外整个之崩溃”。^①

11月末,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破译了中国方面的密码,掌握了中国军队冬季攻势的计划与意图,并通报各地日军注意警戒,但各地日军对中国军队反攻能力颇为轻视,在冬季攻势即将全面发动的12月10日,日方许多将领尚断定:“所谓抗战第三期的总反攻,肯定是痴人说梦”,因而许多地区的日军并未刻意准备应付中方的冬季攻势。^②在冬季攻势前夕,日军在桂南突然登陆,占领了南宁,从而极大地吸引了重庆方面的注意力,使得反攻南宁成了冬季攻势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二、第1、第2战区的冬季攻势

第1战区为助攻方面,主要任务为破坏陇海路等重要铁路及公路线,消耗牵制日军,声援第2战区肃清晋南三角地区日军。该战区的主要对手为日第14、第35师团及骑兵第4旅团等。

12月1日,第1战区首先发起冬季攻势,第3集团军孙桐萱部以第81师及豫鄂边区游击部队4万余人遮断开封、兰封间铁路,一度占领龙王车站,截断了淮阳、鹿邑、通许间的3处公路交通。同时,第81师以一部攻击兰封,主力于17日突入开封城,焚烧日军仓库,击毙日军300多人。21日,骑兵第2军何柱国以骑

^① 《蒋介石致各战区将士电》(1939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第85页。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兵第 3 师深入商丘一带,破坏商丘、罗王间的交通,阻止日军增援开封。该师一度攻入商丘东门,占领了附近的简易机场,焚烧日军存放的汽油,并击溃由砀山来援的骑兵第 4 旅团一部。

在豫北方面,2 月 6 日,新 5 军攻至安阳南北,破坏淇县、浚县、汤阴、宝遂古车站等 4 座铁路桥,切断了道清铁路两段交通,断绝豫北交通数日之久。第 47 军于 12 月 13 日占领了常口、柏山两座火车站,第 9 军则在黄河以北 20 多公里处切断了平汉铁路。1940 年元旦,第 9 军第 41 师一度攻入沁阳城内,歼灭第 34 师团部分守军,切断沁阳、博爱间铁路交通。

第 1 战区在冬季攻势期间共毙伤日军 5 000 余名,缴获机枪 50 余挺,一度还攻入省城开封,并破坏了陇海、平汉、道清等铁路交通及公路交通,第 1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部属坚决执行了军事委员会交付的作战任务。

第 2 战区负有肃清晋南三角地带(翼城、绛县、闻喜、安邑、运城一带)凸出部分日军的重任。根据第 2 战区作战部署,主攻兵团为南路军总司令卫立煌部,下辖第 14、第 4 军第 5 集团军;东路军总司令朱德部任务是截断东阳关、娘子关,阻止日军增援,破坏正太、白晋及同蒲路介休至太原段交通,以一部包围长治一带日军,西路军司令陈长捷部协同南路军攻击晋南日军;北路军总司令赵承绶应率部破坏太原以北同蒲路,主力向归绥东南附近地区围攻日军,与第 8 战区协同作战。

晋南素为中日两军激战不已的区域。在第 2 战区攻势发动前,日军第 36 师团及第 108 师团各一部万余人于 12 月 3 日在飞机 30 架、战车 10 余辆的支持下,向在闻喜、夏县以东的第 5 集团军曾万钟部阵地攻击,战斗至为惨烈。8 日,卫立煌总司令赴前线督战,指挥各部分头迎战,至 11 日,日军遭受重大伤亡后,全军退往闻喜。经 9 昼夜苦战,中国军队守住了中条山,击毙日军大队长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以下官兵 2 000 余人,中方伤亡官兵 2 800 人。

12 月 15 日,日军第 37 师团又由翼城、绛县方面向中条山中部发动攻势,恰好与出击的第 14 集团军遭遇,至 18 日,日军攻势受挫,退守夏县张店镇。到 12 月 20 日,南路军围攻同蒲线南段沿线日军,将日军主要据点完全包围,但攻守双方都无足够力量消灭对手,战事胶着至 1940 年 1 月中旬。

晋东南方面,第 27 军范汉杰部向长子、屯留一线进击,12 月 4 日,该军派遣 2 营部队诱长子日军出城,5 日在右哲镇设伏围攻日军,日军死伤百余人,残军退向长子,范军乘势跟踪包围了长子县城,分兵一部进出屯留,13、14 日占领了屯留附近的一些小村镇。1940 年 1 月 1 日,日军 4 000 至 5 000 人为解长子之围,发动了一次短暂的反攻,第 27 军守住了阵地。3 日晨发起反击,日军不支,中国军队一直追至长子城郊。庞炳勋第 40 军则向壶关外围日军各据点袭击,攻占了修善村、大山、南贾村等日军据点。第 18 集团军第 115 师、第 129 师各一部参加了冬季攻势,12 月 23、24 日,相继收复黎城、东阳关等重要地区。28 日一度攻克潞城,共毙伤日军约 2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60 余枝。

至于西路军陈长捷部和北路军赵承绶部则在第 2 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授意下,利用冬季攻势来消灭决死第 2 纵队等山西新军,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围攻山西新军。阎锡山及部分晋军将领不仅未按作战部署参加冬季攻势,并且与日军关系暧昧,全力对付新军及八路军,致使第 2 战区冬季攻势计划无从实施。

三、绥西作战

第 8 战区在冬季攻势中的任务是协助第 2 战区作战,但晋北的北路军赵承绶部忙于围攻新军,未对归绥附近日军发动攻势,而担负配合任务的傅作义部在绥西则有出色表现。

第 8 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负责统率绥西部队,他接到冬季攻势命令后,向军事委员会表示:“职已下决心,当以整个力量向敌猛拼,牵制敌人,俾利主攻。”^① 并选择战略地位重要的包头、固阳、安北一带为主要攻击目标。当时,日军在绥西仅有第 26 师团的第 13 联队,驻归绥、萨县,另有骑兵集团驻扎包头、固阳、安北各地,由小岛吉藏中将指挥。

傅作义决定在战略上各部同时展开攻击,以牵制各地日军,主力则奇袭包头。他将所部兵力分成 4 路,以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为第 1 路军,向归绥以东日军袭扰,因该军仅千余人,素质又欠佳,故颇少战果。门炳岳骑 6 军为第 2 路军,12 月 10 日,骑 6 军由五原出发,向归绥、萨县间袭击日军,18 日破坏萨县附近铁路数段,23 日一度攻入萨县城。以马鸿宾第 81 军为第 4 路军袭击安北,阻敌增援。第 3 路军为攻击军主力第 35 军,该军由傅作义率领。13 日由五原出发,进攻包头。

第 35 军经 5 夜秘密行军,抵达包头城下,日军当时全然没有发觉。19 日,日军驻包头骑兵集团司令小岛吉藏虽获悉傅作义部准备攻击包头,但对中国军队的方位作了错误判断。20 日晨,小岛吉藏派炮骑兵联队长熊川长致率主力出城迎战傅作义军,而傅军孙兰峰新 31 师便随即乘虚钻入包头城内,迅速抄袭了日军骑兵司令部,缴获大量文件和战利品。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得知包头情形后,急派萨县的骑兵第 1 旅团增援包头。安北的骑兵第 14 联队联队长小林一男与固阳的第 13 联队联队长小原一明自动率主力支援包头日军,在包头城外受到第 35 军主力阻击,第 13 联队伤亡过半,第 14 联队长小林一男被击毙。熊川长致

^① 《傅作义致蒋介石电》(1939 年 12 月 6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率部白跑一趟后,于黄昏率部返回包头,此时,晋北第26师团主力因晋军赵承绶部忙于反共,遂尽量抽调增援绥西。22日,日军向包头城内外第35军进行总反攻,至23日拂晓,中国军队撤出包头,返回原防地。

1940年1月下旬,日军为消灭傅作义部主力,调集步炮兵约5联队,汽车1300余辆,乘冬季结冰,使用机械化部队击退中国军队。2月2日,攻陷傅军根据地五原,4日占临河。傅部实行空室清野,一部向敌后袭击,主力退入宁夏境内和伊克昭盟。日军虽占据了五原等要地,但与傅军主力决战已不可得,固守则兵力不足,不得不自动向包头方面撤退。

中国军队在日军主力东撤后,收复了临河、善坝等地,但五原仍在日伪军掌握之中。留守五原的有伪蒙军4个师,伪警备军,另外有日本军官、特务、文职人员570余人。3月20日晚,傅作义亲率主力奇袭五原,至3月22日彻底消灭日伪军,击毙绥西警备总司令水川信夫中将、特务机关长桑原中佐以下日伪军3000余人。3月底,日军由平绥线增兵北犯,重新占据已遭彻底破坏的五原,但已无余力固守。4月1日,傅军再度恢复五原,至此,后套已全无日军踪影。

绥西战役前后达4个多月,与日军作战57次,五原三失三得,经过反复较量终于收复五原及绥西地区,多次重创日军,使日军此后再无侵犯绥西地区的行动。

在华北地区,冀察、苏鲁战区也参加了冬季攻势,破坏津浦、平汉等交通线,但效果甚微。1940年2月9日,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向蒋介石报告了第1、第2、第8及冀察苏鲁战区冬季攻势经过,并作了如下总结:“本行营所辖各战区之冬季攻势,其中虽不乏战绩卓著、成绩优良者,然较之第四、五、九各战区未免逊色,相形见绌,此因……各战区内在种种矛盾之掣肘,常致成极势,

使计划无由实施。”^① 程潜所称的各战区种种内在矛盾中,最严重的便是国共摩擦,这种摩擦在第 2 战区、冀察及苏鲁战区已达白热化程度,这无疑对团结抗战产生了负面影响。

四、稍挫即止的第 3 战区攻势

第 3 战区在华中地区的冬季攻势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它的战略任务为截断长江交通,使武汉方面日军陷于孤立,从而易于第 5、第 9 战区对日第 11 军发动攻击。军事委员会为使第 3 战区能顺利完成任务,特地增拨了许多门重炮,以便于作战和封锁长江。第 3 战区则计划以 14 个师的兵力达成截断长江的任务。

12 月 16 日,第 3 战区冬季攻势开始。长江攻击军分左、中、右翼 3 个兵团向大通、贵池方向进行正面攻击。同时,第 32 集团军上官云相部和第 10 集团军刘建绪部分别袭扰南昌与杭州,以牵制日军。

长江攻击军中央兵团由第 10 军及第 86 军共 6 个师组成,为进攻主力,第 86 军担负主攻。第一阶段准备占领童埠、茅坦、观前等地,然后突至长江南岸,以水雷、重炮封锁长江。右翼兵团为第 50 军,进攻目标指向铜陵、大通、宁国一线,左翼兵团为第 21 军,担负吴田铺至湖口一线攻击任务。第 40 师和第 52 师为总预备队。至于日军方面,由荻港至湖口一线 25 里的长江防线上,仅配置一个第 116 师团,且兵力分散配置于沿江各处及各个据点内。

12 月 16 日凌晨 3 时,第 86 军发动攻势,最初只使用了 4 个团兵力,预 10 师和第 16 师师长在使用时最初只派一、两个连的兵力,然后逐次增加,尽管用兵不当,预 10 师和第 16 师还是突破了

^① 《程潜致蒋介石电》(1940 年 2 月 9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日军防线,克复了曾形山、解形山等重要据点,大通前长江航路一度被切断。预10师师长蒋超雄,因右翼郭勋祺第50军按兵不动而意存观望,未充分扩张战果。17日,各线仍进展甚微,师、团长们都以第50军未前进为托词,畏怯不前。18日,预10师终于占领茅坦,但日军援兵已至,开始反攻,预10师、第16师连日战斗,牺牲甚重,未能到达江边,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决心动摇,认为随着桂南会战展开,第3战区已退居次要地位,部队“即令到达江边,亦必无继续作战的能力”。^①19日下午,顾祝同下令停止攻击,转取守势。23日,日军猛烈炮击青阳,但未能占领。26日,日军停止反攻,双方基本停止军事行动。

杭州方面,第10集团军第192师和第62师于12月13日晚一度分别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放火烧毁日军设施。1940年1月22日黎明,日第22师团的一个联队渡过钱塘江,在萧山北面登陆,该方面中国守军未能予以有力抵抗。同日,日军侵占萧山,向绍兴挺进。27日,中国第10集团军发起反击,日军退回萧山。

在鄱阳湖西侧的赣江地区,中国便衣队于12月12日及18日分别混进南昌城,破坏日军设施。21日,第32集团军进攻南昌外侧,但未取得大的战果。

第3战区在冬季攻势中毙伤日军数千人,重伤日军中型运输舰4艘,轻伤日军船只5艘。但未能完成截断长江的主要任务。尤为严重的是,长江攻击军以拥有4倍于日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攻势仅仅持续3天即告停顿,致使整个华中地区冬季攻势蒙受不利影响,战后受到重庆方面的严厉批评,第50军军长郭勋祺受到撤职处分。

^① 《总顾问福尔根(苏联)对第3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从整个第 3 战区冬季攻势过程来看,国民党军队的固有弱点表露得非常典型。其一,高级军官缺乏进取精神,执行命令不彻底,这是以保存自身实力为原则的必然结果,苏联总顾问福尔根自始至终参与第 3 战区冬季攻势,发现在攻势过程中“确有直接违犯命令及照其私意而为者,毫未遵守纪律及开战前之各种指示”。^①为了保存实力,结果总是以小部队进攻,而以大部队主力为预备队,以便减少牺牲。第 3 战区动员了大批部队组成长江攻击军,但战时用于第一线攻击的只有两个师,而这两个师不将全部兵力用于攻击,而是逐次投入。其二,部队之间缺乏协同和足够的信任。12 月 10 日,担当主攻的预 10 师师长就公开声明:“在右翼第 50 军占领乌鱼塘以后,我始能前进”。^②其他部队存在同样心理,结果互相观望,行动消极。其三,师级指挥官能力缺乏,战术运用呆板,缺乏步炮协同意识,部队缺乏攻坚训练。其四,对日军攻击有恐惧心理,常常过高估计日军力量,超报敌情 3~4 倍以上,致使上级指挥官难以正确判断战场上的真实情况。

五、第 5、第 9 战区围攻日第 11 军

第 5 战区为主攻方面,负有攻击平汉线南段武汉、信阳方向日军的任务。第 9 战区在冬季攻势之前也列入主攻方面,但因有数十师生力军南下驰援桂南,影响了第 9 战区冬季攻势的威力。

12 月 12 日,第 5、第 9 战区同时对日第 11 军全部正面展开反攻。当时,第 11 军全部分割成小单位分散配置,并无直辖兵团可

① 《总顾问福尔根(苏联)对第 3 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总顾问福尔根(苏联)对第 3 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的报告》,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以机动转用。日军第一线部队及据点起初均陷于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孤立无助,第11军司令部只得拆东补西,增援薄弱环节,疲于奔命。

第5战区以豫南兵团(辖第2集团军、第68军、第92军、豫鄂边区游击总队)由平汉路以西向信阳南北地区日军攻击。13日,第92军占领泉口店、浆溪店、杨柳河,陆续向花山、平靖关、冯家庄攻击。第2集团军向骆驼店、归河、长台关各日军据点迫近。23日夜,以两团兵力分别向信阳东北及西南挺进,攻击信阳日军。12月28日,第31集团军加入该方面作战,1940年1月5日,分别向徐家店、平靖关、花山等处日军袭击,与日军第3师团激战至1月中旬。

右翼兵团辖第33、第29集团军,12月12日,第74师渡过襄河向钟祥以南攻击,兵团主力则分别渡河占领朱宝大桥、西虎山,续向罗家坡、三店、炭埠庙一带攻击,13日占领大小陈冲、张家湾。22日起,围攻洋梓、钟祥等日军,战至28日,日军援兵大至,向右翼兵团全线反扑,两军在普门冲、长寿店以南一线激战至1月下旬,均死伤惨重。

江北兵团辖第75军、第41、第128师,12月12日开始东渡襄河猛攻日军第13师团。日军在罗汉寺方面,相隔五六公里即有一个或两个小队把守的据点,受到江北兵团的围攻,除公议场外,聂家场、同心场等重要据点均为中国军队控制。15日以后,日军第116联队赶来增援,17日拂晓与江北兵团激战于仙桃、泗港一线,江北兵团予日军重大杀伤,但自己的伤亡相当重大,遂以第55师及第13师在雁门附近牵制日军,主力于23日间在襄河西岸撤退。

左翼兵团由第22集团军、第39和第1游击纵队编成,向随县以东的第3师团出击。第45军包围了淅河马坪,第41军则采用以主力正面攻击,以一部侧背迂回的战术,攻击随县外围的擂鼓墩

第一章 从武汉失守到 1939 年冬季攻势

及滚山两个日军重要据点。28 日起,左翼兵团在洛阳店、徐家店一带与日军增援部队胶着,战事陷于停顿。

1 月 28 日,蒋介石电令第 5 战区停止冬季攻势,并嘉奖了该战区,称“此次冬季攻势获有真价值之战果者,当以贵战区为第一”。^①

第 9 战区在赣北及湘北、鄂南同时发起攻势。

赣北方面,第 19 集团军向奉新、靖安、南昌间日军第 33、第 34 师团发起进攻。新 11 师渡过锦江,截断西山万寿宫与南昌间主要交通线,第 51 师占领五步城,截断大城、奉新闻日军主要交通线,第 141 师渡过修河,一度截断南浔路。第 32 军攻击靖安一带日军,12 月 21 日夜冲入靖安城内将张公渡至安义、德安至箬溪间交通通讯破坏。

湘北和鄂南方面,第 15、第 27 及第 34 集团军向粤汉铁路北段日军第 6 师团等部攻击,分袭崇阳、通城,羊楼司、桃林等各线,将第 6 师团各部联络补给完全遮断,使其各自孤立。第 79、第 73 军等主力约 9 个师围攻崇阳西南的大沙坪,攻击非常顽强,持续了 10 多天,屡次迫近大沙坪和岳阳城郊,后由于日军第 40 师团及第 6 师团其它部队前来救援,中方结束了对大沙坪的围攻。冬季攻势期间,羊楼司车站,阳新、崇阳、慈口镇等地均曾一度被中国军队恢复。

在第 9 战区冬季攻势期间,南浔铁路未通行一次,粤汉路只通过一次车。

从 12 月 12 日至 1940 年 1 月底,第 5、第 9 战区围攻第 11 军各处日军据点达 40 余天,出击 960 次,直接交战的兵力达 50 多

① 《第 5 战区冬季攻势作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万,“攻势规模之大和行动之顽强是前所未有的”,^①第11军第一线部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孤立挨打的小部队,全线处于危急之中,伤亡重大,死伤近万人。日方承认,如果第9战区数十师生力军不南调桂南战场,第11军有被击败之虞。^②

六、粤北之战

第4战区在冬季攻势计划中本居于助攻地位,由于日军在第4战区的粤北、桂南两大战场陆续引发桂南会战和粤北之战,第4战区在冬季攻势中便充当了极重要的角色。

日第21军为配合南宁方面日军作战,并挫败第4战区行将发动的冬季攻势,决定先发制人,击败粤北的中国军队,其作战目标是攻占第4战区长官部所在的韶关,将占领区域扩展至英德、翁源一线,准备使用的兵力为第18、第104师团及近卫混成旅团,由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

粤北守军以第12集团军为主体,约10万人,由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挥,第62军黄涛部驻守佛冈、源潭、花县等地区,第63军张瑞贵部驻守从化、牛脊背、梅坑、地派等地,第65军缪培南部驻守英德县青塘和翁源县华屋、大镇圩,为总预备队。

日军准备兵分3路,进犯粤北。由第104师团第107旅团一部组成的西山支队首先沿粤北铁路北上,由新街进窥银盏坳,恰与该方面发动攻势的中国军队3个师遭遇,预备队第65军遂投入该方面战斗。当左翼日军在粤汉线方面吸引中国军队大量兵力后,20日,日军中路和右翼部队大举北犯。一路进展甚速,23日,已占领源潭、牛脊背等地。由近卫旅团组成的中路军于25日越过良口

① 《昭和十四年冬季作战经过概要》,载《现代史资料9》,第419页。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520页。

圩,向北突进。右翼日军为第 18 师团全部,由增城沿增江支流北上,先后占领了龙门、地派、梅坑等地。24 日,左翼日军强渡潯江,广东战时省会韶关受到威胁,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向中央求援,军事委员会调陈烈第 54 军由湖南驰援粤北。

当日军进展顺畅之时,第 62 军黄涛部转而猛攻日军后方的重要据点——牛脊背。牛脊背在从化县城北约 40 公里处,位于翁源至从化公路上,为日军重要补给据点。黄涛部在牛脊背歼灭日军千余人,使中路日军因后方补给线被截断而不敢放胆北进。29 日,右翼日军攻占翁源。30 日,左翼日军占领英德,先头部队抵达新江墟。韶关危急,广东省府临时迁往连县。30 日,第 54 军主力到达曲江,前锋即向翁源、青塘攻击,第 65、第 62 军则作好从南夹击的准备。恰在此时,进犯粤北的日军已迅速自动撤退。事实是,当 20 日日军北犯时,即因南宁战事,已决定缩小作战规模,将作战目标从韶关改为翁源、英德一线,企图尽快结束军事行动。12 月底,昆仑关日军已朝不保夕,第 21 军急于将在粤北作战的第 18 师团及近卫旅团调往桂南增援。从 1940 年 1 月 1 日起,日军从翁源、大镇、河东之线分头南窜。中国军队则尾随攻击,5 日克复英德。到 9 月为止,已追至增城附近,随后恢复了江口、银盏坳、从化,16 日进占花县。至此,中国军队已完全恢复到 1939 年 11 月 20 日以前的原有态势。

从 1939 年 12 月至 1940 年 2 月,军事委员会动员各战区参加冬季攻势,北起绥远,南至桂南,全线出击,给予在华日军沉重的打击,是整个抗战时期规模最为巨大的攻势作战。中国军队在反攻过程中旺盛的士气给日方以深刻的印象,日军“在华官兵都亲身感受到中国军队的抗战力是不可侮的”。^① 日方不得不承认:“中国

^① [日]井本熊男:《作战日记编成的支那事变》第 532 页,芙蓉书店出版。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为最”,^①日军在冬季攻势期间死伤了5至6万人。

不过,冬季攻势未能如军事委员会预计的那样扭转整个战局的形势,也没有一个战区达成预定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冬季攻势无疑是失败了。导致冬季攻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蒋介石及其幕僚判断敌情过于乐观,要求各战区达成的任务过于艰巨。1940年2月9日,白崇禧致电军事委员会时曾指出:“判断敌情应就战略战术之见地作缜密之考察,不可过度偏于乐观,致贻大局。”^②事实上,当时日军在进攻和防守能力上是中国军队远远不及的,它的相对优势是明显的。可以在它选择的任何一个地区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日军真正苦恼的是,它的兵力不足以既守备广大的占领区,又有余力全面进攻,它也寻找不到可以一举决定战争成败的机会和地点。第二,国民党军队自身弱点甚多,尚不具备全面反攻的条件,其装备、训练、士兵素质均远逊于日军。第三,指挥失误。从整个战略指导看,冬季攻势缺乏侧重点,处处进攻,处处兵力不足,无法取得应有的战果。从各战区指挥看,则如蒋介石自己承认的,“此次冬季攻势失败,最大的一个原因,即由于前方部队逐渐使用兵力,而非集中全力攻击,以致没有一个县城被我们打下来”。^③由于这些因素,冬季攻势中,中国军队虽消耗很大,但未能取得一项显赫的战果。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第521页。

② 《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40年2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作战经过(二)》,第242页。

本章小结

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日军大本营都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日战争已演变成持久局面。基于新的战争态势,中日双方于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政略和战略方面均进行了重大调整。

日军大本营决定将主要兵力用于确保和巩固已占领地域,消灭中国的敌后游击部队,掠夺中国的资源,实行以战养战应付长期战争。在正面战场上则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为了逼迫国民政府屈服,日军竭力试图截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1939年间,日军先后攻占了海南岛、潮汕和桂南地区,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南沿海的封锁。日方还诱惑汪精卫集团脱离抗战阵营,并玩弄外交和政治谋略诱降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自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后,调整了战区指挥系统,设立了苏鲁、冀察战区,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显示出对敌后游击战的重视。对国民政府而言,1939年是战局趋于乐观的一个年头。首先,日军停止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缓解了正面战场上的军事压力。1939年间,日军除占领南昌和南宁时作战意图较为积极外,在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等作战中都实行攻势防御,实施有限度进攻后,便退回原防地,姿态消极。其次,国际形势巨变,欧洲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有结合在一起的趋向。第三,1939年大后方农业丰收,经济情况稳定。因而,从1939年春季攻势开始,军事委员会不断筹划有限反攻,以图扭转战局,显现了较为活跃的战略指导意图,而其高潮则是在1939年底发动了正面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作战——冬季攻势。

第三编 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

冬季攻势的失败说明,在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处于防守尚有余力,而反攻则力不从心的状态。虽然处于相持状态,但从进攻和防守的能力看,日军显然占有较大优势。这一事实便是在1939年间对战局估计偏于乐观的国民政府于翌年遭到严重危机的基本原因。